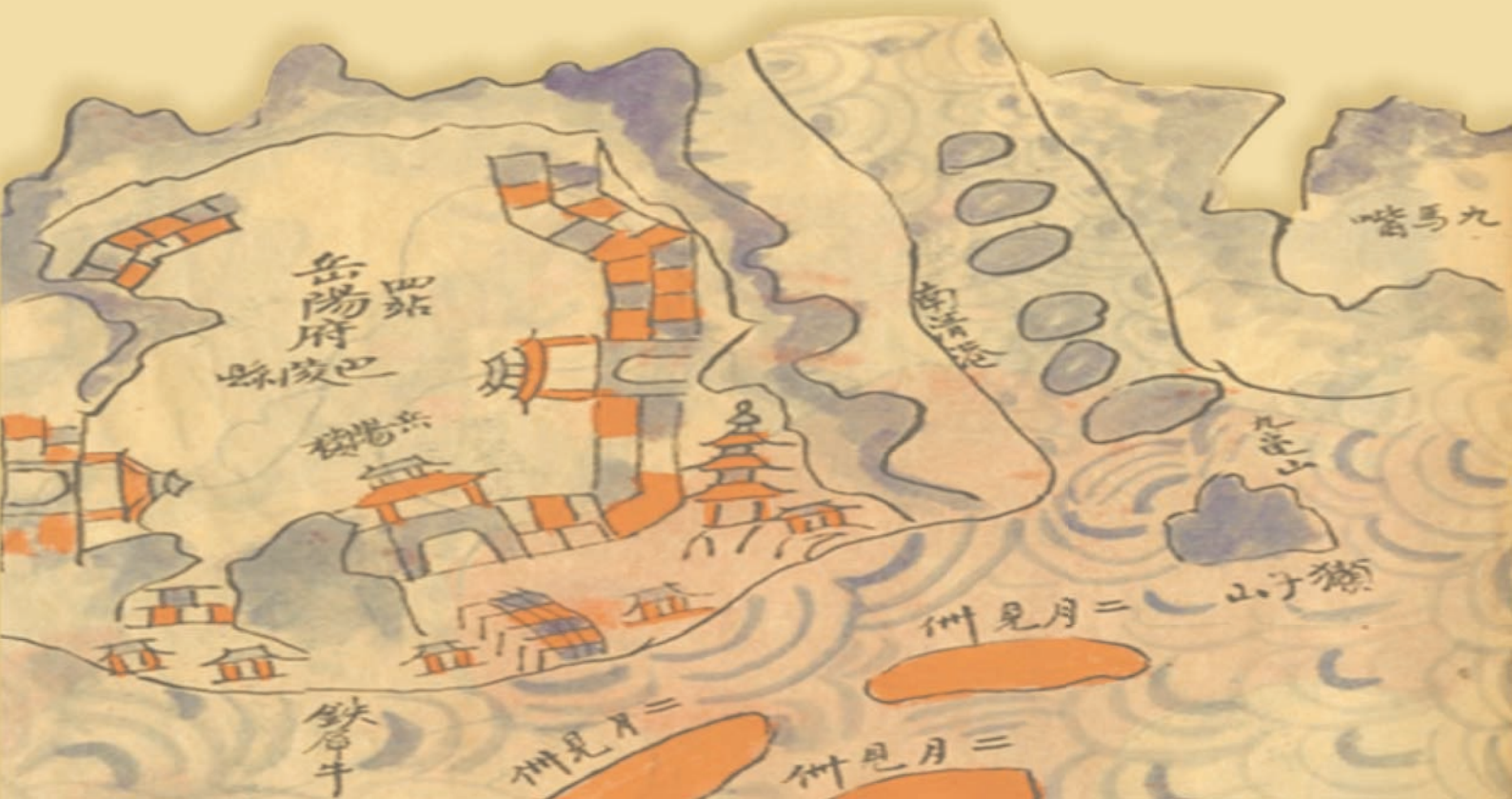




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



2010年6月7日，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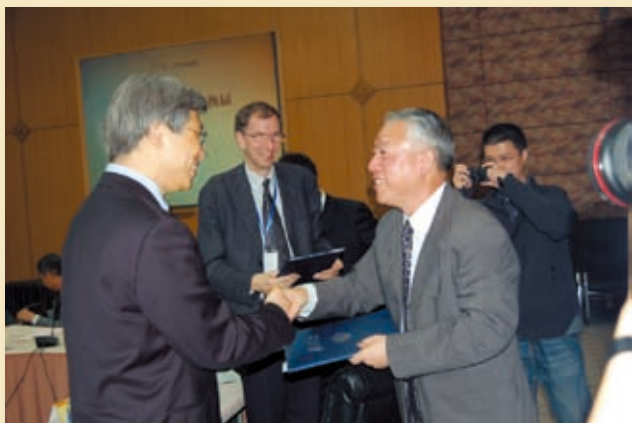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出席座谈会并致辞。



院长葛兆光教授在会上作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工作汇报。



文史研究院第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分别发表评鉴意见。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代表校方向新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会上，我院还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东亚研究所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

目 录

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致辞	2
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致辞	3
文史研究院三周年工作汇报	5
国际评鉴委员会评鉴报告	7
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	9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批评的中国学（二）：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11

复旦文史讲堂

才子与佳人：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 /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14
引路菩萨与引魂明使 / 马小鹤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17
秋坟鬼唱鲍家诗：罗聘《鬼趣图》新论 / 汪悦进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教授	20
永远的圆明园：法国人眼中的“万国园” / 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23
中欧“之间”和移位：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图片传播 / 钟鸣旦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26
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 罗多弼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语系教授	29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二十至二十二）

邓菲 图像、仪式与习俗：对宋金墓葬图像系统的思考	32
田梅（Margaret Tillman） 民国儿童教育心理学：从“儿童学”到“儿童心理卫生学”	33
王平 诗歌中的文本风景：以枫为个案	34
新书介绍 渡边浩、牟复礼等人新书	35
外刊撷英	37
博士后论坛 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驿路聚落研究	40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10.04—2010.06）	41

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3月10日,是教育部指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作为一个依托高校建立的专门从事文史哲基础研究的学术机构,希望通过“从周边看中国”、“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中国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文史哲学科界限,沟通中国研究与外国研究,促进多元历史和多种语言的共同研究。

2010年6月7日,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院长葛兆光教授作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工作汇报,文史研究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分别发表了评鉴意见,并宣读国际评鉴报告。随后,复旦大学校方为新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会议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主持。文史研究院三周年成果展也在会场同时举行。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教授:

首先,我作为校长,欢迎各位的到来。我很早就答应了葛兆光先生来参加这个会,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承诺是很重要的,所以尽管我这两天要在北京开会,还是在昨天晚上飞了回来,过一会儿我还要飞回北京继续开会。

我一直在考虑,文史研究院已经三周年了,我们的

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文史研究院三年,成果斐然,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解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史研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反右、文革等等,对文史研究的人才队伍是一个巨大的摧残,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有了很强的技术主义的倾向。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我们所重视的是怎样把电视机造出来、怎样把冰箱造出来,但是技术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一直到近十年前,才有了一定的改善。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讲,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我一直认为,口号发出了,管理、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是繁荣了,但是人文科学还不够繁荣。



强烈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再混合上西方的工具理性,使得中国发展比较快,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近三五年来,很多文史工作者逐步把研究深入到人心的内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就是文化实力,但是文化实力不等于文化产业,真正的文化是在人们心中,成为思维和行为的习惯。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建立,说明我们在国内的高校中,比所有人都更早地关注到这个问题。这其中在有在座各位的贡献,也有秦书记和葛教授的贡献。

我们现在更加关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关心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到底留下了什么,同时又根据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在全球的视野当中看中华和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看亚洲的文化历史和西方的关联,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和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葛兆光教授在文史研究院的各项活动中,特别强调国际的合作。以前我们曾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觉得中国或亚洲的历史文化研究没有必要和国际合作,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恰恰在这些方面更需要国际合作。

我有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冲突,其根源在于文化造成的壁垒使得世界各国的沟通产生了问题。当然这其中也有语言上的问题,但

是语言本身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正因为这样,我们非常重视文史研究中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及人才的国际化的培养。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作出贡献。前两天我正好读了钱穆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西方文化一般说来灵活性比较强,这是商贸文化的特征,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但是中国文化不同,即使可进,有时候也不应该进,有时候即使是不可进,明明要失败,但是为了正义和平,为了精神,中国人也要进。所以我想,中西文化各自都有优缺点,而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以后所产生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可能会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产生真正正面的作用。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他只强调了文明的冲突,但是没有谈到任何新的文明都是在现存文明的相互交流融合中产生的,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的文明。

所以我非常欣赏我们文史研究院已经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也衷心地希望文史研究院在未来的几年中,在各位专家的帮助下,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最后对在座的各位专家、为文史研究院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不远万里来到复旦,谢谢各位。□

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各位来宾,同学们老师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向文史研究院的老师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向等一下要受聘为文史研究院新

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在复旦大学历史上,创建一个学术贯中西,研究通古今,没有现代学科之限,没有门户之见的人文研究机构,是我们复旦同仁多年的心愿。综观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史,一个好的学术机构,可以汇聚一批好的学者,催生很多高质量的学术创造,形成优良的传统和学风,有的还可以开创一个学派,甚至影响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记得五六年之前,文史研究院是我们学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一批教授共同发起的。当时讨论



“985 工程”第二期的建设,大家都提出,要创设一个融通文史哲,在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面做些探索的共同平台。三年来,文史研究院承载了我们大家共同的理想,今天看来,我们距离这个理想又近了一步,在葛兆光教授的带领下,文史研究院致力于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既融入国际学术潮流,又植根于中国学术传统,产生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得到了校内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文科各院系和国内外同行的关心和支持,我在这里代表学校,一并表示感谢。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对文史研究院,也包括对我校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些想法。

一、希望文史研究院继续坚持既有的研究方向。好的方向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也是一个研究机构能够长期存在的基础。文史研究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坚持明确的学术理念和方向。葛兆光教授提出,要开展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研究,在中国背景下重建中国的自我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五个研究方向。这些方向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盲从于他人,开辟了文史研究新的路径,事实证明这些方向的选择是富有远见的。希望研究院的诸位同仁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希望文史研究院成为复旦大学学术国际化的窗口,海外汉学家集聚的中心。在学术走向世界方面,文史研究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世界著名的汉学家济济一堂,很多已经成为我们的老朋友。我完全同意葛先生的看法,文科的国际化,首先是要能平等地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去对话,这涉及话语系统的转换、研究范式的借鉴和交流。但同时,文史研究又是最传统、最中国的研究,如果本土的东西研究不透,文科的国际化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人文学科研究必须

扎根中国,用中国的语言思考中国的历史,诠释中国的文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的学者来关注中国文化,和我们共同推进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研究。

三、希望文史研究院成为学术管理的创新实验区。文史研究院是我校第七个“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谓创新基地,应该是跨学科、跨院系的平台,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融通学科、消除门户,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融合。近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机构真正要做实、做好,也并不容易,也无一定之规,希望文史研究院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形成一套适应人文学科的、运转有序的、充满活力的机制。

四、希望文史研究院成为学术人才的热土。文科的兴衰,往往和人联系在一起,从大学学科的情况来看,有人,有带头人,学科就兴;人走,学科就衰。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环境条件和天赋才华的结合,需要今后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我们高兴地看到,文史研究院已经凝聚了一批胸怀理想、献身学术的青年学者,你们和我们文科许多优秀的青年教师一样,代表着中国人文学科的未来,希望大家安心向学,夯实学术功底,根基越牢,学问越深。古语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其实,只要真心向学,治学的过程也不一定是苦的,而是其中有乐。沉潜于知识和智慧,涵泳于思想和真理,这是旁人无以企及的快乐。当然,学校也会采取切实的措施,为大家的成长尽可能创造良好的环境。正如刚才杨玉良校长所说,复旦大学对文科的扶植将是稳定的、不遗余力的。我也同意很多国际评鉴委员的意见,办好一个学术机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因此我们希望文史研究院,包括葛兆光先生在内,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办下去。

最后,我预祝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在复旦大学度过美好的时光。谢谢大家! □



文史研究院三周年工作汇报

葛兆光



首先感谢杨校长、秦书记能够光临这次会议,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同时我也感谢我们的委员,无论是海外的还是海内的,你们的到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力量。也感谢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朋友。接下来我用比较短的时间报告

一下三年来文史研究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可为”和“不可为”,逐步使文史研究院集中在五个研究方向。

这五个研究方向,一是从周边看中国,这个过去注意的不太多,现在已经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二是批判地理解国际中国学,推动与海外中国学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三是交错的文化史,这个方向和文化交流史有重叠之处,但是打个比方,过去的文化交流史侧重谈论男女的恋爱和结婚,但现在我们要谈论男女结婚以后所生的孩子,也就是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四是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帮助我们从形象的角度深化中国文史研究;五是中國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艺术史在海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也越来越走向与其他学科互相交叉的研究路径,有鉴于中国的艺术史领域做得还不够,所以希望在这一方面做些努力。

围绕上述方向,我们已经有了系列出版物:“复旦文史丛刊”已有五种研究专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复旦文史专刊”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两种,“复旦文史讲堂”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三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已出版十三期。尤其是刚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5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这是我和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合作项目,汇集了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末叶越南历朝出使或北行中国的燕行

录、北使诗文等相关文献,并附有提要 and 年表。《朝鲜燕行录选集》也将由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明年在中国出版。此外,我们还编纂了一套学术入门书,旨在给人文学科硕士研究生提供基本的研究方法,丛书目前已出八种,在研究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三年来,我们在《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了“文史研究新视野”的专栏,已经发表了国内外学者有关“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领域的学术论文16篇。

三年中,围绕这些研究方向我们还举办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包括2007年与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合办的“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心合办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我们还举办了“批评的中国学”系列学术研讨会,旨在就某些具体的研究领域,推动与海外中国学的相互理解及对话。前两次会议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立场”以及“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文史研究院围绕着这五个方向,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有活力的学术团队,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大家介绍,除了我之外,这个研究队伍的成员还包括:董少新,中山大学博士,精通英文和葡萄牙文,研究明清时期中西关系史;王鑫磊,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韩关系;许全胜,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与近现代学术文化;李星明,东南大学博士,研究汉唐美术史及美



术考古;刘震,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研究中、印宗教和语言;孙英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化史;朱溢,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唐宋史、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和礼学思想;邓菲,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博士,研究宋元美术考古与物质文化;朱莉丽,山东大学历史系博士,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出站人员,主要研究明代中日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在一次向学校报告对外合作的会上我曾说,我们的国际合作,第一要从学术上融入国际,第二要实质性的合作而不是一纸空文,第三要长久地交流而不是一次性的合作。特别要感谢文史研究院的两个委员会,尤其是其中的海外委员,他们帮助我们畅通了国际合作的渠道。

我们开设了“复旦文史讲堂”,截至目前已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做了51场讲演,讲演专家来自英国牛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香港城市大学。我们始终强调文史讲堂的国际性与学术性,它已经成为复旦校内非常受欢迎的品牌讲座。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接收访问学者的机制,十几位海内外的学者曾到文史研究院进行学术访问。同时,我们也与境外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比如,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都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中国出版他们国家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文史研究院也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东亚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达成科研、教学等多项合作的三方协议,过一会儿就要正式签约。

第三,坚持严肃、专业的学院化风格,积极参与复旦大学的研究与教学。

我一直有个想法,在现在的学术界,象牙塔恐怕还是要提倡的,否则我们办研究院就失去了意义。在文化沉沦的今天,在学术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却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坚持严肃的、专业的、学院化的研究。

研究院要坚持高深专精的研究,也要把专门研究

的心得用在教学中。我们越来越明确,研究院是在大学之中的研究院,一定要参与大学的事情,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准。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史研究院的多位同仁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也参与各个系的教学,开设了相关课程。最近,我们向学校提出,由文史研究院来建立一个“亚洲宗教、艺术和历史研究”的博士方向,招收博士生,开展跨越学科、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这个设想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支持,也得到了学校的认可。

报告完我们做过的事情,我想说一点我们的问题。研究院办来不容易,中国现代的学术史一百多年,我们只有短短三年,即使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很欠缺的地方。一是文史研究院与院系的沟通合作仍然不那么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文史研究院没有成建制的院系作为支撑,所以与院系的沟通渠道不是很通畅,这使得我们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平台,其中有我们的问题,也有机制的问题。二是在研究项目回收、督促方面还存在问题。三年中,有很多项目发出去,但是收回能够结项的很少,有些鞭长莫及的感觉,这让我们感到很为难。三是文史研究院吸收了很多年轻的优秀人才,但我总忧虑新老交替的问题,我已经60岁了,如何建设更好的成梯队的队伍,是我很焦虑的一件事情。

最后,我要说一下感想。三周年的纪念不是庆祝,而是反思,让我们回顾这三年以来,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一个研究院要形成特色,组织一个有特色、有凝聚力的学术团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绝不是三年能够完成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个著名的研究机构,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学校研究院。清华研究院只有四年,可以不论;历史语言研究所至今已经八十年,才形成了风格。我在读傅斯年书信的时候注意到,作为史语所所长,他到第五年的时候已经很疲倦了,但是又觉得如果现在放弃,再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我也有同感。就文史研究院来说,一样需要积累,仅仅出版几本书、发表几十篇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和成熟的学术风格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希望各位对文史研究院多一点耐心,让它在今后有更好的发展。□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for Review and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hereafter the Institute) was inaugurated on March the 10th, 2007.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Institute has firm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trong research hub with hig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nd reput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Institute is set up to integrate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transcend the usual boundaries of specialties so that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expertise can work together with mutual benefit and achieve research outcomes that go beyond the narrowly defined fields of study.

One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Institute is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it has included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outside China in its Academic Board and its International Panel for Review and Evaluation, while promoting humanistic studies that put China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Academic Board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for Review and Evaluation have served well in making substantial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stitute with regard to the review of research projects, directions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particularly network connec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ies. The Institute has signed agreements and memorandums with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overseas as well a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including, among others, such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as Tokyo University, Kyoto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arvard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Leide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tc.

The internationality also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determined by the Institute, which put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China as it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East Asian neighbors and more extensively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critical

study of Sinology or China studies from the stance and perspectives of native Chinese scholars. Other innov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the study of images and visual culture and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art history, and religious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another indicator of the close relations the Institute has established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ies. The launching of the Institute in March 2007 was simultaneousl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ith presentations made by several scholars who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Board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f Review and Evaluation. Since then, the Institute has organized or co-sponsor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symposia on specific research areas, which have created a dynamic and stimulating atmosphere for research and have been widely appreciated by scholarly communiti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Institute provides an open forum for promoting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s it sponsors projects not only of scholars at Fudan University but also those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hree years,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have already produc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more substantial research output can b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appear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ch prestigious publishers as Shanghai guji, Zhonghua shuju,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the Institute has launched several books by fellows as well as collections of Institute-hosted lectures. Most recently, a book series of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specifically written for graduate students was launched in June 2009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at Fudan and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These books are important ind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s active role in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y will certainly exert a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Many of the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 delivered at the Institute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uch well-known scholarly venues as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Zhonghua Studies in Letters and History*, and many more publications will appear in due time.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hree years, the Institute has set up a sizeable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research materials almost from the scratch. It has so far recruited ten research fellows through a rigorous process of selection, and will continue its effort at recruitment. Together with senior fellows selected from Fudan's own faculty, the Institute has built up a strong team of researchers and will certainly bring the humanistic research at Fudan University to a new and higher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f Review and Evalu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Institute at Fudan has indeed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research institution truly well-known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at it has initiated a number of innovative projects and scholarly activities, and that it has demonstrated its strength with concrete research output and publications. It is our hope that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keeping with its decided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hrough a process of rigorous evaluation, the Institute will recruit more research fellows with demonstrated abilities in excellent publications or with clear potentials for outstanding research so that it may form a team of research fellows who can be highly competitive in any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be it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In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years ahead, the Institute should try to consolidate its distinct character and clear image on the basis of what it has so far achieved, and it should make sure that all research pro-

jects and all recruited and appointed research fellows a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recognized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the Institute, particularly the two areas of "China as perceived by its neighbors"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inology or China studies" so that the Institute will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in bridging over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China studies abroad, and thereby laying a firm ground for dialogue and 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ies (and not just Sinology).

As Chin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lso shows an increasingly intense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and understanding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Fudan University is well position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in this regard as it has always had a very good foundation among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humanities.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Institute will continue to have the strongest support from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Fudan University in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so that it will become, in several years' time, the most influential research base in humanistic studies in all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Given the accomplishments the Institute has achieved so far, we consider this a perfectly realistic and realizable goal, which will definitely enhance the position and reputation of Fudan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abroad. As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f Review and Evaluation, we shall try our best to work in close collaboration to help reach that goal. □

Signed:


(David Wang)


(Zhang Longxi)


(Nicolas Standaert)

史 馬 達

邢 義 田

顧 彬

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 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

葛兆光

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6月13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新书发布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等,与来自国内和越南的数十位专家齐聚一堂,追溯1314年至1884年五百多年间的中越文化交流,研讨东南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丛书发布会随后也于6月19日在越南河内隆重举行,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主持会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相关人员参会,丛书的中方编撰代表葛兆光教授、贺圣遂社长、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等也出席了会议。2010年是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无疑是中越两国乃至东南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二十五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并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支持的结果。这里我想补充说的话有三点:

第一,这是世界上首次集中编辑和出版越南使者在中国的见闻、纪行、唱和文献。我们知道,越南汉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国际学术领域。除了越南学界之外,法国远东学院百年来重视越南早期文献的收集,包括越南金石碑刻文献的编辑与出版,近年已有很大成果。日本学界也对南中国海及越南的历史与日本漂流人的关系,有很深入的研究。台湾学者陈

荆和的越南史书整理与研究,既得到法国、日本与越南的赞赏,也曾得到胡适的肯定。韩国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韩、越使者在北京的“相遇”与“唱酬”,还注意到两国对汉文化立场的差异。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国学者不只是关注“汉籍”,更进入了“越南文献”研究的领域,这将使这一领域更加国际化。

第二,这些文献的价值,不止于一些中国见闻可以作为中国史料,为历史“拾遗补缺”,更在于它见证的是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化认同”、“观念变化”和“国家意识”。这些文献上起元仁宗延祐(1314),下迄清光绪(1884)。在这漫长的五百多年中,中国经历了



蒙古统治之元代、汉族王朝重建之明代、满族统治下之清代,文化在不断变化,国家形态、政治思想、族群位置也在变化。而越南也同样经历了陈朝、后黎、阮朝等等变迁,既逐渐形成了自我国家意识与文化独立意识,又即将面临法国殖民者的殖民和侵略。把这些文献放在如此变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观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彼此观察的立场、视角、焦点都在变迁之中,而另一方面,由于汉文书写的习惯与文人传统的延续,彼此文化沟通的纽带始终存在。在这种“变”与“不变”中,我们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第三,我研究中国文化与思想,对越南的历史与文化完全是门外汉,更看不懂越南文字。但是,上溯百年之前的历史,由于彼此处在一个“汉字文化圈”,并且

既有密切的交往,也有渐渐的疏离,因此,让我可以方便地利用“互相观看”的资料,“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新的理解。这五百多年间,我们看到各国文化人在北京相遇,以汉字书写与交流,记下各自不同的文化观察,渐渐形成本国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中国的新看法,这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特别有意义。因此,对中国学界来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出版,也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最后,我要感谢郑克孟院长等越南朋友的光临,感谢焦扬女士和陈立民先生的光临,特别要感谢陈正宏、汪涌豪、韩结根三位先生的辛劳和各位年轻学者的参与。在此,也让我们用这一成果,庆祝中越友好年以及昇龙建都一千年。□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批评的中国学(二):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董少新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等渐次来华以及中西关系越来越密切,记载中国的西文文献也愈来愈多。留存至今的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浩瀚,内容极为丰富,且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轨迹、文化关系、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网络的过程乃至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等方面,在这批文献中均有较为详细而全面的体现。但是,由于这批文献涉及多个语种,藏于世界各地,调查、整理和翻译都困难重重,因此大量珍贵的西文文献尚未能得到充分、综合的利用。

为了将来系统开展西文文献的整理与中译工作,促进中国学界对西文文献的关注与利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于2010年5月22至23日召开了“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比利时、德国的十二位长期从事西文文献研究的知名学者,就现存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的总体情况、西文文献对中国学研究的价值、西文文献的使用方法和理论、中国形象在不同时代的西文文献中的演变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由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和北京大学比

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主持。会议收到论文十篇,分为“西文文献之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和具体价值体现”、“西文史料中的中国形象之演变——关于西文文献特点与使用方法”、“西文史料中的中国与世界市场——关于史料与视界”三个主题单元进行发表与讨论。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夏伯嘉教授提交的论文为《自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介绍了自明万历年间至清乾隆中叶近两百年的天主教中国传教史文献,尤其讨论了各种文献形成的历史背景、种类、分布情况与使用的方法和问题。浙江大学哲学系戚印平教授发表论文《日译天主教东传史及东西方交流史文献概况与主要特点》,介绍了日本学界在西文文献日译方面的成就,以及这些日译西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价值,为西文文献的中译提供了经验。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任韩可龙(Henning Klöter)教授提交论文《早期西文文献中的官话与方言》,详细介绍了西方人留下的多种汉语语言学资料,包括词典和语法书,尤其是十七世纪初之后在菲律宾编写的关于闽地方言的文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副研究员提交论文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认为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西文文献，有助于突破我国史学界所存在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界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中国史的内容与内涵，乃至通过西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促进学术研究转型的可能性；也对西文文献的系统中译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

西班牙塞维里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李毓中**先生的论文《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档案里的中国》，以西班牙人在东亚殖民扩展的历史脉络为背景，介绍了他们留下的中国史料的书写、运送及保存的来龙去脉，使从事此领域研究的相关学者得以了解西班牙文史料的面貌，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毛传慧**助教授的论文《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就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法关系的演变，探讨法国在华调研目的、方法、内容和形式的转变，同时介绍这些档案、文献和史料在法国的收藏概况，进而对这些资料之于中国研究的价值做了论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蔡香玉**提交论文《荷法文献中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介绍了她近年来在荷兰和法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荷、法文档案文献，按照作者身份对这些文献做了分类，并认为其中一些文献与中文文献具有互补性，如《利邦上尉的日记》；不同西文文献之间可以互证，如德胜（Isaac Titsingh）和范罢览（Andre Everard van Braam Houck-

geest）的日记；而这些文献合起来便共同构筑成一个有关南方沿海地区的历史情境。

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廷茂**教授提交的论文《十六至十八世纪葡萄牙海外文献中关于中国贸易的记载》，根据作者近年所知所见，分信函、游记、专书和编年史等四个部分，概述了此期葡萄牙文献中有关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特别是进出口贸易的记载，分析了这些记载的特色和史料价值，认为葡语文献中的相关记述，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有重要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补阙作用。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方真真**副教授的论文《西班牙塞维里亚印第安斯档案馆收藏有关中菲贸易史料的概况》，介绍了该档案馆中有关中菲贸易的丰富资料，并通过这些文献考察中菲之间的私人经济活动。澳门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Van Dyke）**教授提交论文《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期西文文献中的中国贸易》，将其所介绍的文献分为三类：公司贸易记录、私人贸易记录和游记，描述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内容，认为这些文献可以补充中文史料在诸多历史细节上的不足。

5月23日上午，在夏伯嘉教授的主持下，钟鸣旦教授详细介绍了鲁汶大学汉学系电子资料库，随后参会代表与校内外嘉宾举行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会。本次会议的论文预计将在年内结集出版。□

复旦文史讲堂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才子与佳人
——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

马小鹤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
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引路菩萨与引魂明使

汪悦进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教授

秋坟鬼唱鲍家诗——罗聘《鬼趣图》新论

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永远的圆明园——法国人眼中的“万国园”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中欧“之间”和移位——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图片传播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语系教授

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复旦文史讲堂”以学科交融的视角,探寻传统文史研究的前沿发展,尤其注重展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的中国视境。自2007年3月以来,已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了五十三场学术讲演,成为复旦学子接触国际学术前沿的窗口。本期刊出最新六场讲演摘要,以飨读者。

才子与佳人——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演讲人简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汉唐时期考古、历史、文物与美术史。著有《丝绸之路——通向中亚的历史故道》、《中国通史·隋唐史·隋唐考古》、《唐代金银器研究》、《走进死亡之海》等,主编《花舞大唐春》。



我们在史学研究中,经常面对不同的史料。一般来说,一类是所谓的正史,一类是野史小说,还有一类是人类有意无意留下的实物资料。正史历来被史家所关注,野史小说则经常被忽视,不过也有人使用,实物主要在考古学、美术史研究中被人们所重视。《李娃传》是唐代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故事梗概比较简单,作为文学作品已经被反复探讨过,也曾被一些历史学者作为社会史料,但还没有被纳入考古学研究范畴之内。我今天就是要用考古材料来解释《李娃传》。

这个故事以爱情与世态人情为题材,通过人物的人生、境遇来表现人性,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它在人物

塑造上带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明确的时代性;在叙事的结构上,呈现网状交织的场景。故事发生在长安城内,所以小说中穿插着人物的容貌、服饰、烘托故事情节的道具、环境等很多素材。遗憾的是,因为只有文字没有视觉形象,我们只能从文字当中去感悟、想象。考古学出现以后,我们发掘了很多古代遗址,还有一些文物如石刻、壁画、雕塑等。我们尝试把《李娃传》和考古发现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连缀起来,对《李娃传》作一个重新的解释,把文字的描述形象化、人物的行为立体化、故事的情节空间化。

我们知道,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他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人。故事发生在天宝年间,地点在都城



长安,主人公是富家子弟和高级娼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段、范围和特定人物的历史框架。小说里首先对佳人和才子有一种描述。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小说有一种格套化,就是男女相爱,悲欢离合,最后大团圆结局。当时的人物塑造、场景描述也是格套化的。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我们可以大致猜测《李娃传》主人公的形象。小说里李娃是“长安之倡女”,我想大概就是十六七岁,风华正茂、极力打扮的一个妙龄女子。小说里说的荥阳公子,可以猜测应该是年轻士人的形象。

在小说里面,他要去京城赶考。他父亲给他准备了两年的盘缠,鼓励他“一战而霸”。小说中写“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毗陵,就是常州,这是汉朝名,唐代人常以古地名来称地名表郡望。“月余抵长安”,他怎么去的呢?他应该基本上沿着唐官道走的,那时官路“三十里一驿”。按照《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二千八百四十五里”,他每天大概要走六十多里。

按照他的年龄和经历来看,他肯定是第一次来长安。长安无固态的文化,但有无止境的仕途,对他来说,是一个花花世界,也是一个梦幻世界。所以,我想小说写到这里,就给他日后的堕落埋下伏笔。

当他到长安时,“居于布政里,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长安是中古城市,它的特点是实行里坊制度,宫城、皇城在城北的正中,宫城、皇城的东、西、南三面是居民居住的里坊,两边对称有东市、西市,这是长安城的格局,在考古发掘中可以印证。荥阳公子到了长安以后,住在布政里,我想是有特殊安排的。因为布政里离皇城很近,离城市最重要的横街很近,而且离西市也很近。然后他又“游东市还”,接着就进了平康坊。做文学的人大概非常清楚,平康坊是唐朝非常有名的地方。唐代时曾居住过李林甫、孔颖达、褚遂良等,但是更突出的是,这个坊在当时是妓女聚居的一个坊,是“红灯区”。故事所展现的空间环境是长安的娱乐中心所在,最具诱惑力,也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荥阳公子来了,马上就到平康坊,而且还到了西南隅的鸣珂曲,唐朝的娼妓中高级的都在鸣珂曲。他到了鸣珂曲,见到一个院子,不大但很干净、整齐。在考古发现中唐朝院子虽然有大小差别,但格局基本雷同,

都是有大门、中堂、后院、正寝,两边有厢房。

到鸣珂曲以后,他就看到了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这几句话,其实讲的就是男女一见钟情式的相遇,小说中还有很多更详细的描述,这里都略去,因为我们主要是通过考古材料来复原故事。进到屋以后,看到娃母,实际就是老鸨。一鸨一妓,这是长安比较高级的地方常有的。

荥阳公子进去以后,李娃跟丫鬟说要“整妆易服”以后再去见面。在壁画里有很多唐朝人照镜子的场景,但李娃打扮不是一般,还要化妆。唐朝人化妆很复杂、很讲究,考古有很多发现。从材质上说,有各种材质的化妆物品。出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脸上都有花钿,会修眉。关于化妆,我们曾在洛阳的李景由墓里发现一整套梳妆奁,里面有粉盒、胭脂盒、梳妆盘、刷子、梳子、篦子、铜镜等等。梳妆奁是县令夫人用的东西,可以想到李娃所用的化妆品大概也就如此。

打扮好就出来了,“明眸皓腕,举步艳冶”,很有风度。我们知道唐代女子的衣服主要是襦、裙和帔,有时还有半臂。唐朝女子上身穿襦、下身穿裙,显得很挺拔,但是却有一点呆板。所以需要个帔,来柔化整个设计,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风范。还要有簪和钗、梳子、项链、耳环臂穿等饰品。

公子进屋,两人坐下喝茶饮酒,“器用甚洁”。我估计李娃用的可能是产自西安附近的一个唐窑,既不是特别高级、也不是特别低级。酒壶也是这样,和茶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喝酒和喝茶没什么区别。两人相见恨晚,有说不尽的话,结果聊着聊着鼓声敲起来了。老鸨问公子住在哪儿,他说“在延平门外数里”,其实他是故意的。《唐律》中有规定,一敲鼓(六百捶)坊门皆闭。从平康坊到延平门外数里即便他骑马,也绝无可能走出去。这时候公子很爽快地拿出“双缣”,准备晚饭。缣是一种双丝的织物,跟绢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文献里有记载,“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价值很高。

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行囊全部搬来了,与李娃“同居”,终日花天酒地。很快就“囊中尽空”,连他的马和仆人都卖了。一天,李娃骗公子去寺院求子。唐代的寺院现在还有南禅寺、佛光寺。求完子、烧完香回来,



李娃就去她姨家。正坐在院里喝茶,突然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于是李娃就先回去了。我这里要讲一下,汉、北魏、唐出土的马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唐朝建立了马场,引进、繁殖西域的良马,所以唐人心目中的好马还是西域的,在故事里叫“大宛”。

公子等了很久,还不见李娃回来,他就去了李娃家。到那儿一看,李娃和老鸨都不在了。第二天到了她姨家发现上当被骗,只好返回布政坊。三天不吃东西,到最后房东怕他死,就把他弄到了凶肆里。凶肆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寿衣店,主要是做死人的东西。古代的凶肆是非常发达、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结果他就开始唱挽歌,而且唱得很好。东市和西市两个市场里都有凶肆,每年会举行比赛争胜负。东肆东西好,西肆唱得好。荥阳公子唱挽歌很出名,东肆就偷偷地把他挖过去。比赛时东肆出了个乌巾少年,他一唱,声音就感动了大家,跟着一起痛哭流涕,非常悲哀。正好仆人去看比赛,认出之后就马上报告他父亲。于是他父亲把他叫到曲江池,打得不省人事,后来便成了要饭的。一天大雪,他出去要饭,走到了李娃家门口,两人相认。后来,李娃伺候他慢慢恢复起来,鼓励他参加科考并把

钱全都拿出来买书。《汉书》记载汉代长安城也有书店,唐朝也有卖书的,而且基本上可以买到所有科举考试用的书。

公子考上后授官到四川一带。他父亲正好是他的上司,古时地方官到任一定要见上司,怎么见呢?先要“投刺”,“刺”就是名片。唐朝没有随葬的习惯,所以没有“刺”出土,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南北朝时期的朱然墓的考古发现,上面一般写明郡望、名字,以及“再拜”、“问起居”之语,基本格式就是这样。父子相见,公子就讲述了整个过程,他父亲决定让他们结婚,最后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古代结婚一定要找媒人,所谓“明媒正娶”,而且一定要备“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我们从壁画、陶俑中能見到少量的一些有关婚礼的情况。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把野史、小说、考古都综合在一起,进行重组。至于把这个故事复原得怎么样,我就知道了。好,谢谢大家。□

钱云 摘录

引路菩萨与引魂明使

马小鹤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演讲人简介：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亚史，编著有《伊本·赫勒顿》、《甘地》、《辨喜》、《光明使者——图说摩尼教》；译著有《菊花与刀》（合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十字路口：公元 250—750 年》；撰写论文多篇，收入《摩尼教语古代西域史研究》。



刚开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引魂明使，从摩尼教的角度来研究一些材料。后来材料让我更多地转向研究引路菩萨，跨入了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范围，而且还跨入了韩刻汉籍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课题。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1974 年日本奈良大和文化馆出版的艺术品目录上有一张黑白图版，被称为佛教的“六道图”。近年来，日本学者泉武夫、吉田丰，德国学者 Jorinde Ebert，美国学者 Zsuzsanna Gulácsi 先后考证，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六道图”，而是含有摩尼教成分的一幅绘画。荣新江先生和吉田丰先生经过释读图版题字，认为可

以把这幅图称为《冥王圣图》。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吉田丰认为不是六道而是三道轮回，这是摩尼教的观念。第一层是士农工商，没有太大争议。第二层是地狱审判的景象，这是类似于阎罗王的审判，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考证，这应该是摩尼教中的平等王演变成平等大帝。在这层能看到一位女神，她自左面从天空下降，后面有两个侍女。对此西方学者理解为她是在干预这场审判，女神可以使灵魂命运得到好转。最下面一层则是地狱的景象。

今天主要讨论第二层的女神和她身旁的两名侍女。吉田丰在研究这幅图画的时候，提出一个想法，是



奈良大和文化馆藏目录
所收《六道图》

的主体,这是与材料相关的方面。

日本学者和其他学者对引路菩萨的研究,主要是以敦煌绘画为研究起点,直到清代。当中有很大一段,日本学者没有搜集太多的材料。我觉得自从冢本善隆的研究之后,现在的研究还可以发掘出相当完整的材料,而且可以分析引路菩萨从敦煌壁画到水陆画之间的演变关系。

大家比较熟悉的引路菩萨是斯坦因收集品 47,现藏大英博物馆。我们看一下这幅图的细部,有小胡子的应该是男性,所以引路菩萨的形象和观音菩萨在中国的演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旁边就是引路王菩萨所引导的亡灵。这个人的形象,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是比较写真的肖像画,这在英国学者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当中已经提出来了。这个菩萨和供养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一般,是通过一串念珠连起来,有引导灵魂通向天堂的可能,是引路菩萨形象的一个萌芽或前兆。斯坦因收集品 46 和吉美博物馆、甘肃省博的一些藏品也都表现了类似的场景,但具体形象有差别。

当时日本学者除了对上面提到的敦煌美术作品进

行研究外,还对文献进行了研究,但至今为止没有人在佛经中找到引路菩萨的出处。日本学者发现了一些资料,能够说明引路菩萨是一种中国的民间信仰,其中一种就是《张思柔造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另外还有著名的文学家苏洵的《嘉祐集》中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这里面讲到“观音、势至、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用这个资料就可以证明敦煌和四川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来往。但这是日本学者几十年前做的研究,中间这一段有很大的空缺。我觉得以现在的资料,我们可以把唐代到今天、敦煌到霞浦完整地连起来,说明引路王菩萨虽然有些变化,但一直在中国民间得到传播。

1994 年在山东汶上宝相寺中发现一座佛像,据说像的背后有“引路”两个字,这说明引路王菩萨的信仰已经传播到山东地区了。在《大足石刻铭文录》中有一条资料,写着“地藏王菩萨”、“引路王菩萨”,说明在宋代绍兴年间,这种信仰也在四川地区流行。

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在山东、河南、四川、福建等地发现的引路王菩萨的图像和文本,也很难对解答引路王菩萨在传播当中到底处于怎样的结构,他在神谱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起多大的作用。我受到戴晓云的博士论文启发。她的重要突破是找到了解读水陆画的一个文本,就是《天地冥阳水陆仪文》,有北京国图和普林斯顿两个版本。通过将《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和水陆画对照起来,在我这个题目上,就对引路菩萨有了更深的了解。《仪文》有

三卷,分成各种不同的仪式,其中一个仪式是“诏请诸灵仪”,这展现的就是出钱办水陆法会的施主首先考虑自己的亲友,希望他们灵魂得救上升天堂。另外在普林斯顿六卷里面,除了三卷《天地冥阳水陆仪文》,还有两卷《天地冥阳水陆杂文》,这两卷《杂文》的



斯坦因收集品 47《引路菩萨》



性质和我们上面讲的科册非常类似。

除了水陆画、《仪文》，还有一种《焰口》以及《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也提到引路王菩萨。这些大多数是明代文献。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日刻汉籍《清俗纪闻》也讲到了引路王菩萨。山西芮城目前还有引路菩萨的风俗，一直维持到今天。

下面是第三章，我着重讲朝鲜的资料。我曾在关西大学听葛兆光教授讲西域和东海，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我做唐代或唐以前西域的摩尼教，会涉及到现在和东海。可是材料自然而然就把我引向那里，使我确实体会到文化的传播。

引路王菩萨不仅流传到朝鲜，而且朝鲜的各式文本超过了中国。如哈佛燕京藏《天地冥阳水陆杂文》、松广寺十六世纪的《天地冥阳水陆杂文》、1642年保留在湧珍寺的《天地冥阳水陆斋仪》、《天地冥阳水陆斋仪纂要》乃至《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等。

下面的部分是借助图像和文献，向大家介绍一下引路菩萨在水陆法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众多佛像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以毗卢寺壁画为例。

毗卢寺的殿是方形，在南、北两面墙上各有一个门，所以又分为北墙东侧和西侧、南墙东侧和西侧。这些壁画画满了各种各样的佛、菩萨、龙王。在南墙东面，画在最上面的是引路王菩萨。因为是菩萨，画得比

其他往古人伦的图像都大，都是由他所引导的。南墙西面画的是面燃鬼王和启教大师，他们所引导的都是一些被老虎咬了、被车轧了之类的人的亡灵。为什么会有两个引导？前面是由引路王菩萨引导的往古人伦，哪怕是地位很低的奴婢，应该也是正常死亡的。而由启教大师所引导的，都是死于非命。这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通过这些基本分析，引路王菩萨在毗卢寺全部122组神、佛、鬼中处于特殊地位，他身旁没有其他菩萨，专门引导往古人伦。

我们通过图像和文本的对照，大致可以讨论引路王菩萨所引导的亡灵范围，我认为从帝王将相到奴婢的所有各级人，但都不是死于非命者。后者在很多图像和文本中，基本上都是启教大师所引导。

我的结论大致是：引路菩萨早先在敦煌壁画中是起到引导施主的某一个亲属去世以后走向天堂的作用；到后期，引路菩萨已经发展成众神中的一个，所引导的对象已经不限于死者的亲属，而是引导整个“往古人伦”的菩萨。当然对于以后可能的研究，我们还有进一步研究的材料和空间。□

钱云 摘录

秋坟鬼唱鲍家诗——罗聘《鬼趣图》新论

汪悦进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洛克菲勒讲座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艺术史。代表著作有 *Shaping the Lotus Sutra: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塑造〈法华经〉——中国中古佛教的视觉文化》)、《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合著)，副主编两卷本《佛教百科全书》。



《鬼趣图》这个题目许多人做过，而且做得很好，不过他们多是用图像来阐述医学史和思想史的问题，我则想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谈谈这幅画。

美术史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简单说可以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拉系谱，比如要讨论《鬼趣图》，就要看看中国画鬼的传统，从吴道子画鬼说起，然后是龚开、颜辉等，一直发展到罗聘。这一路拉下来，好像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罗聘的《鬼趣图》了。但这种方法有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是，罗聘是不是有条件在十八世纪基于这种系谱来作画？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印刷术，所以虽然这个思路影响很大，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

识。在西方，美术史是一门带有“德国口音”的学科，而德国人的线性意识很强，认为历史就是从 A 到 B 线性发展的过程。东西方的遗产都给美术史造成习惯性的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把美术作品放在现代人设定的某种宏观趋势里面。比如，说起《鬼趣图》，就说这是中国漫画的发端。这就等于把《鬼趣图》作为漫画史的起点，这样说也不错，但是一旦这样想，就把它的意义给确定了，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关注的重点就会放在它怎么讽刺时事、针砭社会上面了。现在很多关于《鬼趣图》的评论，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这些基本上都是纵向思维,而现在的美术史研究对这种思维有一种反动,倾向于横向地去观察美术作品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有陷阱,那就是机械的比附。常见的方法是先讨论一段历史背景,然后再讲美术品,好像因为有了历史背景,就有了某个美术品。还有一种我称之为庸俗的思想史方法,比如说,清代人爱谈鬼,清代中叶谈鬼成风,在这个风气下,就有了《鬼趣图》。这也没错,但是没有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鬼趣图》很奇特,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做历史最怕孤立,因为孤立的东西很难跟其他东西相比较,所以对我们的阐释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同时,这幅画的意义又很大。第一,它有 150 多个题跋,多为清代的名贤、学者所题,像翁方纲、蒋士铨等人,简直就像十八世纪的名人录一样。第二,由于当时的文字狱非常残酷,大家都不敢轻易留下文字,可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居然有那么多的官员和名流在这幅画上留下了笔录,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清代人特别爱讲趣味,而趣味又往往是在文字以外的,袁宏道曾说,“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读文学史的都知道,这套看法是从诗论里面来的,所谓“诗有别趣”。清代人爱看戏、爱说戏、爱论戏,“诗有别趣”就变成了“戏有别趣”,最后发展到什么都得有趣味。清代的一位戏论家黄周星说:“今人于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感人者。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洁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就是说,什么事都是有趣的,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谈曲。要给它个名称,可以叫做“泛趣论”。正是在这个语境中,罗聘的好朋友袁枚对他说:“知其趣者谁,其为吾与汝。”至于什么趣,他就不说了。

这比较典型地凸显了美术史上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凡是好的美术作品,都有“别趣”,都不在语言之中,它打动你,但是让你说不出来,也说不清楚。通过对个案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对美术体验的本质问题作一探讨。其实我觉得艺术史最迷人、最有挑战性的

地方,恰恰在于那“说不清楚”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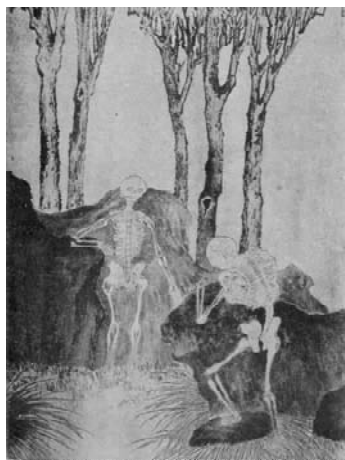
《鬼趣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散页拼起来的,各页的尺寸都不一样,这可能是画家偶尔为之或者因情而作,也可能是在做不同的探索,总之,作画的时候未必有一个总体的构思。

这幅画共有八帧,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最后一幅。关于这幅图,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多考据。钟鸣旦的研究认为,这个图是来自于欧洲的人体解剖学,具体来说就是《人身图说》翻成中文之后的插图。不过这其中也有点问题,就是罗聘画的比《人身图说》好,更接近欧洲原本,可能他还有别的渠道接触欧洲的人体解剖图。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鬼趣图》远远比解剖学的意义要大,因为它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很说得通,也符合中国画的语法。150 个题跋中,没有一个提到欧洲,当然可能也有人知道,但是大家觉得不必这么看,当时人首先想到的还是吴道子,还是中国的思路。

这幅画的背景是寒林。从元代开始出现了“寒林钟馗”的组合,而且因为元人的文人气比较强,把钟馗改造成了一个骑驴觅诗的文人形象。另一个经常画的题材是“钟判官”,钟馗到阴间做了判官审鬼。还有一种是醉钟馗,罗聘就曾给御史曹学闵画了一幅醉钟馗,表示现在是太平盛世,负有“捉鬼”之责的御史也无事可做,整日醉卧。总结来说,钟馗就这么三种:寒林、判官、醉。这是罗聘可以参照的三种形象。除了钟馗之外,罗聘可能参照过的还有一种“秋林共话”,他的老师金农就曾画过这类的画。可能罗聘自己也在考虑,是画成寒林钟馗呢,还是画成秋林共话呢?

尤其重要的是,在欧洲的人体解剖图中,画的“主角”本来是一个手持镐头挖坟的劳动者,到了罗聘



罗聘《鬼趣图》之一



这里就成了上等人,而外面的这个人还在作揖,这样一来,两个人之间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分别。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意象是“鲍家诗”。“鲍家诗”是鲍照的诗,自从李贺写了“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这两句诗,鲍家诗的意象就广为人知了。“碧血”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苌弘含冤而死,血化为碧色。罗聘自己就写过类似的诗:“销魂一卷鲍家诗,翠袖天寒泣竹枝,定有秋坟鬼争唱,三更正是雨来时。”不仅画家自己把《鬼趣图》与鲍家诗联系起来,看到画的人也会这么看,在所有的题跋中,有三个人提到了“鲍家诗”,其中就包括内务府总管英廉。可见,鲍家诗这种联想在观者当中是普遍存在的。

《鬼趣图》大概画于1766年左右。1771年,罗聘把它带去北京,请达官显贵观赏、题跋。过去学界对罗聘去北京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大致上是说,1760年左右,扬州的盛世已经过去,经济萧条,罗聘到北京是为了卖画。扬州有一位学者张郁明对我启发很大,他质疑说,如果罗聘是为了卖画,为什么他在京师声名大噪之后,再也没画第二幅《鬼趣图》?他再画《鬼趣图》已经是三十年之后,而且画得也不大好。

我在这个质疑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罗聘是一个画家,到了北京之后,为什么能够结识这么多的官员和名流,又为什么非常急切地想进入英廉的小圈子里去?

1768年,扬州出了一件大事,有人告两淮盐政、乾隆的小舅子高恒贪污,乾隆大怒,结果两淮盐政、盐运使都被砍了头,大盐商江春等也被押解至京审讯。这些盐商其实很委屈,因为乾隆下江南都是由他们接待,为朝廷花了大把的银子。很有趣的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当时审判江春等人的供词和笔录。据记载,江春“惟磕头引罪,绝无牵引”。张郁明认为,是扬州盐商把罗聘派去北京“做公关”的。盐引案发生在1768年,罗聘是1771年去的北京,盐引案久而不决,1779年罗聘又一次进京,有种种迹象可以表明,这

次罗聘其实很不愿意去,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已经病重。果然,他去北京不久,妻子就死了,可是罗聘居然没有赶回扬州奔丧,还在给英廉作画,而且他还写信给盐商,托付家里的事,很显然他身负盐商的重任。不仅如此,就在罗聘第一次去北京的那一年,内务府库中拨了30万两白银给江春,而内务府的总管就是英廉,这是罗聘最急于讨好的一个人。

当时,罗聘住在英廉的独往园。很幸运,我发现了当时他在独往园为英廉画的一幅画。这幅画画的是“江南烟雨”。英廉在江南做过官,也在江南发迹,所以罗聘作这幅画可能有点“叙旧”的意思在里面。这幅画的题诗说:“落叶荒村急,寒星破月明,不眠因酒薄,开户觅秋声。”“落叶荒村”的出典可能是《琴心记》:“落叶荒村,搅西风去来飘滚叶呵,今日归根,何日逢春。”虽然不能敲定这里的“春”就是江春,但是至少应当留点神,因为江春的花园就叫“秋声园”。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前面提到的种种意象叠加起来,其中的意趣就更值得玩味了。钟馗、钟判官代表着诉冤的意象,“鲍家诗”也有含冤的意味,好像有点去北京上诉的意思,而英廉给江春拨的30万两白银,可能就是“上诉”的一个结果。

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画交流的语境是非常微妙的,我的阐释也只是一种可能,不一定就是这样,但是中国画在实际的历史情境中,确实成为了不同阶层的交流媒介。画家、赞助人、观者之间的交流是怎么个过程,用哪些修辞手段达到交流的目的,都是值得深究的。很多画都起到过这个作用,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去重构。好在我们有《鬼趣图》,有江春的供词,有其他种种证据,我们也懂得鲍家诗在中国语境中的意味,这些加起来,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段志强 摘录

永远的圆明园——法国人眼中的“万园之园”

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演讲人简介：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法国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著有 *Voltaire et la Chine*、*Visions de l'autre: Chine, France*、《伏尔泰与孔子》、《法国文化史》（合著）等，译著有伏尔泰《中国孤儿》、迪迪耶·埃里邦《神话与史诗——乔治·杜梅齐尔传》。



法国有一部《小罗伯尔词典》(*Le Petit Robert*)，其中一卷是专有名词词典，相当于一部小型百科全书，里面有一个“圆明园”词条，我今天就从这里说起。这个词条译成中文是：“圆明园——最光明之园，从前的夏宫，中国皇帝夏天的行宫。位于北京西北八公里处。始建于十七世纪雍正朝，完成于乾隆朝。圆明园曾是‘万园之园’（王致诚语），占地 350 公顷，它藏有大量无价之宝与图书。乾隆曾让耶稣会士艺术家们（郎世宁、蒋友仁）在此修建了欧洲式宫殿，周围环绕着喷泉与水法。1860 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随后又被

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付之一炬。”

这段文字对圆明园的历史、价值介绍得比较全面，其他涉及圆明园的词条还有王致诚、郎世宁、蒋友仁、乾隆等。《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的选目非常严格，读者面很广，而“圆明园”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关内容也较长。由此可以推断圆明园已经进入到法国人常识性的知识结构当中。

如果我们从形象研究这个角度看，可以肯定地说，圆明园已经成为法国人言说中国的一种套话式的形象，也成为了关于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的一部分。一



个形象只有在长时间里反复出现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叙事中,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被普遍接受、符号化后才能称作套话式的形象,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的总体想象。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圆明园进入法国人认知场的历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对这座皇家园林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据《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介绍,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第一个在信件中向法国人、欧洲人揭示了圆明园的存在。他称圆明园为“万园之园”、北京的凡尔赛宫。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此乃人间天堂。水池依天然形态砌就,不像我们围以墨线切割出的整齐石块。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其艺术造诣之高,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王致诚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领悟到和西方迥异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原则,就是师法自然,重自然怡趣而不尚人工雕琢,并且以他的传神之笔把这种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介绍给了他的同胞们。1749年,王致诚这封信登于《奇异而有趣的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在法国、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

十八世纪是法国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文化转型期,那个时代的法国人正经历着从旧有的神与人的关系过渡到重视人与人关系的阶段,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间的幸福。那么远在北京,被传教士们描绘得如此奇巧、幽深、千姿百态的人间天堂——圆明园,就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启蒙大家伏尔泰(Voltaire)在《哲学词典》中“美”的词条下讨论美的相对性时,基本上照抄了王致诚的信。在建构和普及一个形象的时候,名人重写所产生的效果是原作无法比拟的,正是伏尔泰的再书写大大扩大了这封信的影响面:王致诚笔下的圆明园,因伏尔泰的大名而被赋予了象征价值。其名、其景、其状不仅为普通人所知晓,并且迅速为公众所接受、认可,进入了法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场,成为他们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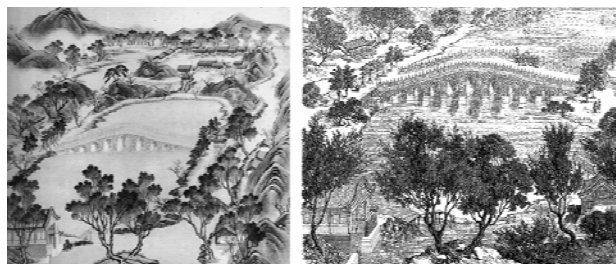
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作家的思考里,更表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的是“盎格鲁—中国式的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专家认为它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传入英国的对中国园林的介绍。而伏尔泰的转述和对美的相对性的

论证,更是赋予了这种有悖于西方传统的美学原则以合法性、权威性,使启蒙时代的法国人、欧洲人可以毫无顾忌、大胆地突破传统,去追求富含革新意义的异域美。很快这种花园就从英国传入法国和欧洲各地,我们可以用很多图片给大家展示当时在欧洲各地出现的中国式园林。

那么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园林的变异体,就把圆明园由平面文字的线性描述转变为立体实景的空间展现。然而这样一座法国人曾经参与设计和建造,又在法国人确立现代美学观念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艺术殿堂,为法国人如此赞叹的园林之王,百年以后却毁在英法联军的手里。法国人对此事的态度显得较为复杂。《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对这一事实并未掩饰和隐瞒,在这个词条里它坦然承认“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不过它也没有忘记在十一行的行文末尾明确标明,被劫后的圆明园是被额尔金爵士付之一炬的。这个结尾很耐人寻味。

法国当代有一位资深记者、历史学家和作家伯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1860:圆明园大劫难》(*Le Sac du Palais d'été*)。作者花了很大工夫去寻找当年参与圆明园劫掠的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翻译这些人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日记、书信,他是用这些人的描述来重构这段历史。书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是法军首先占领了圆明园,甚至先于英军洗劫了圆明园。但对于火烧一事,法军却一反洗劫时的疯狂,一致谴责英军的放火行为,称其为“哥特人的野蛮行为”。书中也引用了一位英军军官的反驳:“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卢梭盟友们将那儿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或据为己有或毁之为快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下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在浩劫过后圆明园不复存在的时候,法国人如何言说曾经进入了普通人认知场,被符号化、象征化了的圆明园。

1864年,圆明园浩劫后的第四年,法国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环球》(*Le tour du monde*)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刊发了汉学家鲍吉耶(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所写的一篇文章《探访圆明园》。他在回顾中国历代以来御园的建园史以后,尽其所能援引了他



《探访圆明园》插图之一“曲院风荷”与乾隆画册原图

在中法文献中找到的所有关于圆明园的描述。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他的专家身份确保了叙述的准确性、渊博性和学术性,影响可想而知。对于形象研究来说,鲍吉耶在一百多年后对圆明园的重述也就理当成为法国人集体记忆的联结站,起到了恢复、重建民族记忆,并把这个记忆现实化的作用。

文章的配图都是法国画家根据从圆明园中抢走的一本包括了“四十景图”在内的圆明园画册临摹的。将原图与仿图对照可以发现画法有诸多不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时不断地闪回到原图册里的编号。这种反复闪现的信息,切断了全文历史陈述和景点描绘的连贯性,不时地把读者拽回到现实中,既凸显了万园之园的文化价值,又提醒读者它已惨遭毁灭的惨痛现实。当读者为此惋惜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把罪责全部推到额尔金身上,指证英军首领是焚毁圆明园的主犯。那么法国人为什么非要把圆明园的被劫和被焚严格区分开来呢?在字里行间揣摩、捕捉、辨析其中的意义,就不得不把这种区分与法兰西民族的自我定位、自我想象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历史上,法兰西一直是以她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明而著称于世,法国人当然以此为荣,也自诩为世界上最文明、最重视文化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实在难以让自己和额尔金这种劣迹斑斑的野蛮人相提并论,因此他们根本无法面对、也绝对不能背负毁掉人类

文明代表作的罪名。而在火烧圆明园的罪行中,他们只有跟英军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和了断,才能洗刷自己的罪孽,摆脱良心的责备和世人的谴责。《探访圆明园》一文正代表了1860年以后经过法国人重塑的圆明园形象,它以交织呈现圆明园辉煌的往昔和残破的现状为特色。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磨难》(*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里描写了女主人公生活的北京,其中一个场景是写北京郊区的圆明园。寥寥数笔的描写中,连续使用了“废墟”、“隐约可见”之类的词语。在形象研究中这类词叫做“幻觉词”,这样的词语,一读就能引发很多的想象。这个事实上不复存在的皇家园林变成了能够引发无限遐想的幻想之地。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出现的圆明园仿作,标志着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已定格在圆明园,同时它也使我们看到套话式形象顽强的生命力。一个形象,一旦被套话化,一旦成为社会总体想象的一部分,它就进入到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永远都不会消失,不管它在现实中的命运是怎样的。

以上我以《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提供的文字为基础,大致回顾了圆明园在法兰西民族心理中逐渐积淀、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神话的历史。从字面上看,整个词条都是在言说他者,言说客观存在的圆明园的建园史、它的价值以及被毁灭的命运。但透过叙事者的选词、行文,也明显能读出法国人对自我的言说,他们对这座瑰宝级园林的崇尚,对建园贡献的自豪,对毁园罪行难辞其咎,但又不愿也不敢直面现实的尴尬、复杂的心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十一行文字言说、承载的是法国人对中法两百余年来文化关系的一种反思和总结。□

钱云 摘录

中欧“之间”和移位——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图片传播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著有《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地”谈“天”》、《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等。



“中欧‘之间’和移位”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因为英语的 in-betweenness 和 displacement 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太清晰，所以我希望能逐步、细致地讲解它们的意思。

我先从利玛窦这张图片开始。在欧洲有许多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图片，研究者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他们的关系。一种方法是从传播的角度去看，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怎么介绍天主教或者欧洲科学，怎么影响中国人，所用的资料大部分是西文文献。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中国如何接受和面对天主教或欧洲的科学，这类研究着眼于中国人，大部分研究者用的是中文文献。

这两种角度有好处也有短处，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看利玛窦和徐光启之间发生了什么。意思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的发现不在于利玛窦，也不在于徐光启，而是在他们之间 (their in-between)。这个概念对学习历史也有一定的影响。历史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现的方法包括文献、图片、艺术品、建筑、团体、礼仪等等。那历史学家能做什么呢？历史学家看到的、接触的就是这些材料，可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研究这样的题目，我们需要“移位” (displacement)——历史学家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比如，文史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从周边看中



利玛窦与徐光启(版画)

也有一个“之间”，也有一个接触。现在我主要用图片一步一步来解释这个概念。

我的演讲分为五个部分，先从资料开始，再看旅行中的图片，进一步看创造新语境的图片，然后集中于“透视力”，最后阐述关于移位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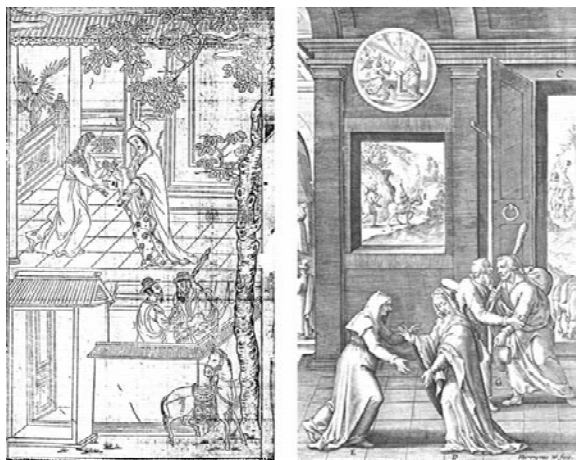
先从资料开始，看看十七世纪明朝末年从西方（主要是欧洲）传到中国、且已中文化的图片。共有四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包括很有名的四幅图片，收在程大约的《程氏墨苑》（1605）里，是利玛窦提供的北欧、德国雕刻师的一些版画。其中一幅先流传到日本，变成日文的图片，之后才传到中国变成了一张中国雕刻的图片。第二个系列是罗儒望的《诵念珠规程》（1619），这是诵《玫瑰经》的一本书，其中15张图片都来自《圣经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这些图片和原来的图片有不少的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之间”的交融——不能说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也不能说这完全是欧洲人的，这是中国人和欧洲人接触交融的结果。第三个系列是1637年左右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这是在福建传教的很有名的传教士艾儒略出版的一本书。第四个系列是《进呈书像》，是汤若望1640年呈献给崇祯皇帝的，实际上是一本西文书，在呈献之前他做了一个中文的副本。全书包括48幅图像，其中10幅出自《圣经故事图像》，其余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雕刻师的作品。这是第一步，我们看到了

国”：我们怎么从周边看中国，这需要一个移位，我们思想和概念的移位。例如从日文十八世纪的资料看中国，我们要把自己“移位”到这个时代、这个坐标上重新观看中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之间”的移位，历史学家和文献、图片

四个系列，在图片被传播、接受、出版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宗教团体、礼仪团体接受这些图片，否则就不会流传，图片跟这些团体密切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些图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明代中国人）在图片中出现，由此可见，接受图片的团体并不是在图片之外，而是在图片之内。

现在转向第二个题目——旅行中的图片。要研究的是，图片怎么传到中国去，怎么从中国传回到欧洲，图片在两地之间的交流是怎样的。第一个故事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开始，他是第一个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传教士，当时奥格斯堡公爵想献一份礼物给中国皇帝，礼品中有一个精美的橱柜和一本书，金尼阁乘船将礼物带到了中国，之后的二十年这本书的下落我们无法得知，直到后来汤若望在北京将它献给了崇祯皇帝，并制作了一个中国版本，这就是《进呈书像》。在这个过程中，一幅画变成一个雕刻，又变成很小的彩绘，来到中国，又重新变成一个木刻本。第二个例子是将图片从中国传到欧洲去，我的故事是关于Adriano de las Cortes的《旅行报告》。这份《旅行报告》传到欧洲，其中的图片在1670年《荷兰使臣前往北京的报告》中出版。这些图片跟《三才图会》或类似的类书中出现的图片很相似，传教士先弄到《三才图会》的书稿，然后在荷兰出版了这些资料，最后我们又在一个器物上发现了跟图片有关的元素。这说明，图片在旅行、传播的途中还会有材料的变化。

第三个部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图片创造出的新语境。举个例子，大家都熟悉的罗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的《人身图说》（1630），它与原书相比有一些变化：欧洲原版绘有象征死亡的锄具，但这一元素在其中国版本中被忽略。最为明显的区别还是在于肌肉、皮肤和经脉的画法。有一个解释认为，希腊医学侧重对肌肉的观察，而中国医学则将关注的角度放在皮肤和经脉上。比如说，同一时代像李中梓《内经知要》（1642）这样的书，中西画法是不同的，西方用明暗法，但中国却用线条表示，所以在每个环境中，图片也有它的特点。进一步看这些图片的历史，西方解剖学中的骷髅，在中国只在罗聘的《鬼趣图》（1772）中出现，用于描述佛教里的地狱。所以原来解剖学的元素传到了



《诵念珠规程》与《圣经故事图像》插图

宗教性的绘画里。因此,图片的历史不只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只是有形的材料,而是图片本身的一种转变。这是第三点,语境和图片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进入图片本身讨论透视力。这是近期西方人讨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热门题目,主要有两种透视画法,等距画法和几何画法。区别在于,几何画法汇聚于一点,等距画法则讲究平行。举例来说,《孔子——中国的哲学家》(*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是第一部翻译《论语》的西文书,其中的图片很仔细地用几何画法绘成,而中国的圣迹图则可以清楚地看出用的是等距画法。其中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原来《圣经故事图像》用的是几何画法,而在中国的版本中有些图片变成了等距画法。我们也能够找到西方出版的采用等距画法的图像资料,如1785年在西方出版的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实际上,同一本书中也会同时存在两种透视画法,这说明交流是多样的,不能只看西方对中国或者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同一本书有多元的方法来接受别文化。

最后一点谈引起移位的视点。以《圣经故事图像》为例,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介绍祈祷的方法——默想或存想。用图片来祈祷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图片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但也会受到图片的影响过大而限制自己的想象空间。后来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图片上标注ABC,按照顺序造成移位。实际上,中国的图片是否也有移位的方法,这是我想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们对佛教比较了解,就会发现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比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691),专门解释如何运用想象力默想的方法。不过,《诵念珠规程》中的图片和《圣经故事图像》原版图片有所不同,前者有两个场景,而且人物被“移位”了。我们再去比较明末与之类似的图片,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都被一堵墙、一扇门分隔为两个场景。门和墙,让图像变成了一个历时连环图。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图也有创造移位的力量,因为是图片本身让我们移位了。通过这些我想说明的是,中、西方图像同样具有创造移位的功能,区别是,西方的方法是标注次序,而中国图片用另外的方法,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再回到我最开始提出的观点,历史学家、艺术学家作为观众,都跟图片有一个“之间”,我们去探索原来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之间”。这也是《坤輿万国全图》的价值,地图上的序言都是利玛窦和中国知识分子彼此讨论的结果,可是就我而言,他们不仅创造了这幅地图,也创造了一个引起接触的空间。而且,不仅是那个时代,直到现在我们依然通过这些资料,进行着中西文化“之间”的接触。□

陆静 钱云 整理摘录

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语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语系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院长。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著有《论1928—1929年的普罗文学论战》(瑞典文,1980)、《从毛到财神:论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瑞典文,1998年)、《儒家:东亚的一个主要人生哲学》(英文,2006);译著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英译,1988)。



孔子曰:君子不器。康德也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同样的观点,中西方哲人虽然在表述上稍有不同,但这种观点在中西方都有其深刻的根源。中西文化间的交流至少已持续了两千年。由于双方间的相互影响,中西方传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两者间相似的特征并不能归结为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更像是源于某种超越文化与历史边界的人类基本共同点。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相似之处看作是源自普遍人性。孔子与康德,就是这种相似性的一个重要例证。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显示出,人文(人本)主义虽然通过两套不

同的概念表达出来,但在某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上仍是相通的。这些相通的理念与价值观正是连接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桥梁,也在我们面对当前的种种挑战时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所谓“君子不器”、“人是目的”,就是实现了人的尊严。这意味着一种指导人们如何与人相处的道德立场,更表达出关于人何以为人的一些信仰。

中国儒家传统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认为,人



生而具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人的天性即是趋善厌恶的。我们不应将这种道德乐观主义斥为过于天真。孟子也认识到人容易犯错,但他坚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今人乍见孺子入于井”的寓言就是一则明证。孟子相信,如果在合乎礼制的环境中育人,顺从他们的天性,尽可能地教导他们,人们将继续为善。这就是孟子性善思想的本质。

在“君子不器”这一道德体系里,“不器”就是人实现了自身的潜能的标志,在这个体系里,尊敬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也许无法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完全等同于 dignity(尊严)的词,但在儒家道德体系里,对于人,尤其是实现了他天生潜能的人,尊严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儒家传统中的“敬”是有等次的:所谓“敬”是下对上的关系。因此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只有位于社会上层的人才拥有尊严,尊严并不是人所共有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儒家虽然重视等次,尤其是在儒学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时,平等的思想也同样存在于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孔子就曾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没有与某一概念或现象相对应的文字,并不表示这样的现象就必然不存在。其例可见于在同一文化传统中。如在欧洲, humanism 一词及其同义词的出现,要远远晚于人文主义典型事例的出现。类似地,在跨文化比较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问题。例如,“自由”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并无准确对应,但如果就此断定中国没有自由这个概念,或者自由不受重视,就不对了。

当然,“自由”一词与其同义词有着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意义。自由的核心意义之一在于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这样的思想在道家学说中有很多反映,“逍遥”就是庄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顺应自然,不受他人的干扰。对我而言,这就是对自由的呼吁。

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大家表明,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对尊严、自由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建立在人性的概念上的。我虽然只举了儒家与道家为例,但在佛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中,这样的例子同样可见。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思想,更是证明了维护人的

尊严的重要性。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同样,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规范也是建立在人性的概念之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坚信人性本善,一个人不会有意作恶。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像孟子。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就没有这么乐观了,他意识到,人可以选择为善或者作恶,甚至也可能会主观上想要作恶。这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和荀子有相似之处。

我们会发现,欧洲传统从早期起就开始关注自由的重要性。对自由的渴望表现为对压迫的反抗,获得自由是一种护卫尊严的方式。欧洲传统中,选择的观念、自由选择与自由意志作为道德伦理的、哲学的、宗教的讨论核心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了。相比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关注点或许就是欧洲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

欧洲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中,善与恶的斗争被视作存在于个人内部的,个人被看作有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这使得个人成为需要承担责任的道德行为体。公元四世纪,圣奥古斯丁首次将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引入基督教传统。他一方面强调,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类意志必然会追求快乐,而真正的快乐只存在于上帝那里。此后的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许多思想家,如托马斯·阿奎那,都对圣奥古斯丁的思想进行了详细地阐释。

神学领域之外的哲学传统对自由意志问题的看法也非常重要。许多思想家都认为,除非人有自由意志,否则责任与道德都不存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康德将自由意志假定为道德的必要条件。但他也在努力调和自由意志的思想与休谟及其他人在经验主义传统下发展出的因果性的观念。二十世纪,萨特及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有自由、也有责任认清他们是谁,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存在主义的话语中,“存在先于本质”是人类生命的基本特征。

当很多思想家致力于解决他们所察觉到的因果性与自由意志间的矛盾时,其他人则将因果性设定为自由的一个前提。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志的本质已是如此:人能做他想做的事。如果他们将重点放在意志上,



则他们也强调了自由必须包括“控制”意志的能力。

就自由而言,经验主义者的关注重心通常不同于那些关心因果性与自由之间矛盾的人。对经验主义阵营中主张自由的人来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做某人实际想做的事的自由,而不是人为什么愿意这样做。这种自由的重要性在欧洲逐渐被强调,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被作为新兴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当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意义上的自由适应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市场经济的需求。

言辞与事实,理论与实践

我选取“human nature”、“freedom”与“dignity”这三个概念,围绕它们来构建我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讨论。其中“human nature”等同于汉语中的“人性”。“na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nascor”,即“生”。“生之谓性”,汉语中的“性”也有类似的含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传统中并没有“freedom”与“dignity”的同义词。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某些词在西方语言中也没有准确的对应,比如说“诚”,还有“情”。虽然这些词在欧洲语言中并没有准确的对应,但我相信,它们的意义可以通过欧洲语言作较为准确的翻译。欧洲的概念与前现代中国的概念之间并

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人仅仅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当贫穷或压迫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当人们不能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表达他们的意见时,我们并不能说,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人性、自由与尊严的观念。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都产生了关于真正文明的生活的观念与价值。

但是,人类文化也生成了其他的观念与价值,成为了压迫的种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采用前者而非后者。但可悲的是,太多时候,我们都做了相反的选择。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西方传统中那些美好的概念中找到慰藉与欢乐。但我们也必须考量它们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并试着通过它们造成某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研究中西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深对这些传统的理解,并阐释它们。但我们也绝不能满足于仅仅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无视我们引以为豪的价值观念与丑恶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差距,提醒他人与自己,这些差距的存在,是对我们所珍视的自己文化中美好思想的侮辱。□

诸颖政 摘录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二十至二十二)

图像、仪式与习俗——对宋金墓葬图像系统的思考

邓菲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带来了大量宋金时期的墓葬资料,尤其是中原北方地区较为流行的仿木结构的砖雕壁画墓,其题材丰富的墓葬装饰与精美的壁画及砖雕工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研究集中分析了豫中、豫西北及晋南地区发现的几组宋末金初时期的砖雕壁画墓。在这些墓葬中,墓主夫妇的画像通常处于整个图像装饰系统的中心。壁面上的其他图像题材包括备食、乐舞以及杂剧等场景,围绕其画像展开,充分顾及墓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的墓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墓葬空间中强调墓主夫妇画像的中心地位,试图创造一个宴享乐舞的立体环境。

备食、宴乐等场景为墓主夫妇提供了完备的日常服务,构成了死者永恒的幸福居所。但如果究其深意,这些题材的选定可能还出于其他目的。研究者很难单独就墓葬材料本身来判断建墓者或赞助人选择这些装饰题材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我将研究的材料扩展到宋元时期山西地区的民间寺庙,试图通过比较墓葬与

民间寺庙的空间与壁画来推进这一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部分民间寺庙存留的壁画中也发现了备食、乐舞、杂剧等场景。这些题材在寺庙主殿中的位置与其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较为相似,也构成了一个围绕主神塑像展开的立体空间。山西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的杂剧表演壁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例子。在该寺中,用于杂剧演出的戏台同样保存下来。通过分析寺庙碑刻中有关戏台的材料可知,杂剧戏曲在当时具有娱神事神的重要功能,而明应王殿中杂剧表演的场景很可能正表现了敬神献乐的仪式。如果将这一假设推广到殿中的其他壁画题材,备食、乐舞等场景也似乎与当时的迎神赛社仪式有关,寺庙壁画的许多内容都可能反映并再现了民间的祀神活动。事实上,山西地区的一些稍晚期的民间寺庙也在其壁画中明确表现出神灵尚食、献乐及神灵出行的画面。

备食、乐舞、杂剧等内容不仅是迎神赛社活动的重要内容,这类活动也出现在民间的丧葬仪式与习俗中。墓葬中的图像题材很可能与当时的葬俗存在着紧密的



联系。音乐设祭常与丧葬相联系,宋时民间竞相用俳优伎戏为亡者设祭;备食、供饮也是祭奠与丧仪中的重要内容。相关的丧葬仪式内容,很可能影响到墓葬建筑空间与图像的设置,在墓葬中也出现了以不同形式、媒介表现的备食、乐舞场景。

这种空间与图像题材的设定,一方面反映了古人

希望在死后永享人世之乐,另一方面也与生者对死者的祭奠相关。在这种理解下,墓葬似乎可以视作一个与丧葬礼俗相关的永久性空间。墓主在该空间内享受各种宴饮与娱乐,而其后代又通过设置这些图像题材对墓主夫妇进行供奉和祭祀。□

民国儿童教育心理学——从“儿童学”到“儿童心理卫生学”

田梅(Margaret Tillman)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二十世纪早期,尽管心理学在中国(与欧美相比)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中国的心理学家确曾试图改善儿童在家庭与学校里的环境。在幼儿教育理论上,辛亥革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其主流议题出现了从“儿童学”到“儿童心理卫生学”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运用“儿童学”来达到解放儿童与“非孝”的政治目的。如沈兼士在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号的〈儿童公育〉一文中,就倡导用儿童学的理论来培养一代革命的孩子。此外,儿童学的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不同的政见,儿童学成为他们支持各自政治思想的载体。现代儿童学的倡导者邹谦和沈兼士,尽管都批评传统的大家庭,却是出于完全相

反的目的。沈兼士希望通过“儿童公育”来推动社会主义;而邹谦反对大家庭公共财产制度的出发点,却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财产权利意识,因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

此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日本的儿童学理论,但随着后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化,更多的教育家赴美留学,也开始受美国“心理卫生论”的影响。当时日本知识分子认为儿童学是一种“纯科学”,而美国的“心理卫生学”(以及其它教育思想)则比较偏向应用,比如提倡在法律上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家也希望更多地涉入政治活动,如担任大学的重要职位等等。

儿童心理卫生学家对家庭制度的态度,事实上是既批评又辩护。1923年杨肃的《儿童心理卫生讲话》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承认存在着深刻的家庭问题,认为孩子有权了解父母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也不主张改变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并鼓励孩子尊敬父母。同时,中国的心理卫生学家也希望把儿童心理卫生的思想本土化。1944年,宋思明在《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中说:“吾人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皆赖所得之经年,所沾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也。”宋氏引用墨子的说法来证明心理卫生学在中国也能找到渊源。

心理卫生学非常契合当时的“新生活运动”。按照心理卫生学理论,家长可以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进



民国讽刺画《染帛》



而改善儿童的精神面貌。同样,新生活运动也强调良好习惯和爱国精神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政府倡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此背景下,心理卫生学家认为可以从教育着手来改善社会,即先改善“学校卫生”,再影响到家庭与其它的社会空间。

大体而言,儿童学家比较接近新文化运动批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做法,而儿童心理卫生学家则采取了支持中国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与前者相比,他们在批评当时的社会习惯之外,更相信社会与国家再建设的可行性。□

诗歌中的文本风景——以枫为个案

王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

诗歌通过语言构建出的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差甚远,其间的文本风景(textual landscape)简单说就是通过文本传承而得来的。任何传承都是一种顽固的重复和积淀。传承同时也一个诠释的过程,其间会充满误解,甚至错误。在本文中,我以枫这个古诗中的常见意象为例来具体阐述这个观点。

“枫”在《全唐诗》中所见即有 300 余处。根据现代人理解,枫的美感源自其红叶,尤其在秋季,初霜乍来、气温陡降之际,醉酒般的枫叶如仲春红花给人带来喜悦之情。可是,和我们这种直觉正好相反,在中古直至唐代,诗人因循着一个不太为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常常将枫展现在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下,青枫林而不是红叶扮演了此类诗歌的主角,其诗意情绪也往往是阴郁并带有一丝哀伤和神秘感,其对人的感官照应不来自视觉而来自听觉。

造成这种现代理解偏差的根本原因是对枫这一名物的误解。“枫”可以指两类木种:槭树(*acer/maple*)或枫香(*liquidambar/sweet gum*)。槭树就是我们惯常叫的“枫”树,而后者枫香有时候也被叫做“枫”树。这两种树木属于完全不同的木种,可由于叶形相似,常常被混淆。槭树决定性的特征是“成对的有翼果实,称为‘翼果’或‘翅果’”,还有“枝上对生的叶片”。而枫香却有“互生、尖端(三至七个裂片)的掌状叶片”,与槭

树完全不同种,能够产生树脂,其果实多刺,呈棕褐色,球状。

中国古诗中的“枫”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枫香(*sweet gum*)而不是槭树(*maple*)。枫的诗歌意象最早可上溯到《楚辞招魂》里“湛湛江水兮上有枫”句,枫在此诗中的出现与枫木在南方宗教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比如招魂仪式。枫香树善摇且招风而发出的飒飒声响以及其树胶可成人形等特质与其能为巫师所用一事实不无关联。南朝诗人十余次写到“枫”,除谢灵运外,其余基本传承楚辞之意象内涵,换言之,枫的诗歌意象与忧思忧愁的忠君之士屈原及其坎坷命运紧密相连。唐代诗人包括李、杜也皆因袭此传统,并纳入更多有关生死离别的悲剧意象如月、乌啼、猿鸣等等,偕同枫一起营造一个忧郁母题,绵延不断地演奏者哀苦乐章。

《枫桥夜泊》一诗或许是最有名的跟枫有关的千古绝唱,但其中心意象“枫”极可能是“村”的窜文。从俞樾发端起,多有学者讨论。本人认为“枫”被窜原因是其意象传统已深入人心,以致覆盖了作者本来的声音。即便此诗中“枫”字不是诗人的原文,但要说“千金一字”,则仍非它莫属。因为,其丰富的文本内涵是打开这首诗之文本风景的钥匙。如果说张继是画龙者,则读者则为点睛者。□

新书介绍

- 渡边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至十九世纪》，东京大学出版会 2010 年 1 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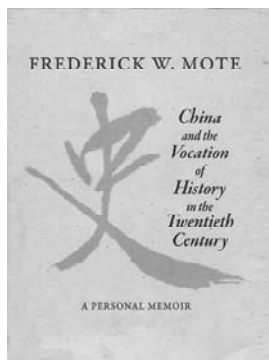
“我们究竟居住在怎样一个国家？我们又将何去何从？”人类一直为这一系列问题所困扰。本书从德川时代到明治前半期日本人的立场来审视上述问题，进而勾勒出十七至十九世纪日本人在思想、意识、心理上的变化过程。正如作者所说，文字如同一部时间机器，

可以将读者带回到四百年前的江户时代。在书中读者不仅能与伊藤仁斋、新井白石、荻生徂徕、安藤昌益、本居宣长、海保青陵、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思想家促膝谈心，还能进入以武士阶层为代表的江户时代普通日本人生活中，从当时的社会风俗中体悟由德川藩幕体制到明治维新社会日本政治思想之变迁。

该书对学者习以为常的通识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常识背后被忽略的动因。例如在本书第十五至十九章中，渡边氏分析德川藩幕体制崩坏原因的同时，不仅强调了西洋文化的冲击，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作为江户时期日本政治思想核心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武士阶层中的普及，造成了武士统治的正当性由内部瓦解，与此同时西洋文化带来的全新价值观也在外部助长了这种趋势，这两者一

内一外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日本政治思想的变革。与以往单纯从政治思想本身的维度进行的考察相比，本书中所使用的大量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的方法或许能为十七至十九世纪日本的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李若愚）

- 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二十世纪的中国与史学的使命：一部个人回忆录》(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



牟复礼是二十世纪最为卓越的汉学家之一，早年在美军特种训练计划接受中文训练并服役于战略情报局，因而机缘巧合地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作为一部史学家的回忆录，该书结合个人的经历与观察来理解中国的思想转型和社会转型，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大调整背景之下史学变迁的轨迹。作者曾说：“我不想写一部自传，而是希望将个人的观察与现代史家笔下的记录两相对照……写作的角度是个人的，是作为一名探寻中国历史分量与内涵的‘文化上



的他者’。这本书不是一部综观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而只是从单个史学家(我本人)有限的经验中窥视这一宏大的主题。”

在《前言:中国史学的特质》一节,作者讨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变迁,以及中外史学界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发生了何种巨变。作者试图跳出西方和中国本位,聚焦于中外史学实践,尤其是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和中国历史研究的使命与认同所发生的变化。讨论的两条脉络,一是中国人如何认识和研究自身的历史,二是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中的发展。

该书由汉学家高慕柯(Michael Gasster)作序,正文分为四部分:《初到中国》、《南京的大学环境,1947—1948》、《思想界的喧嚣,1890年代至1940年代》及《二十世纪中叶的史学:多种思想倾向的并存》,并有若干篇附录及补遗。书中还收入一些作者未发表的资料,记录了天主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受挫、二战阴影下的中日关系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兴盛等诸多方面。

• 《鼎和五味》(“复旦文史讲堂”第三辑),中华书局
2010年6月出版

这是“复旦文史讲堂”的第三辑,收录的是从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半年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的十一场讲座的全记录。这十一次讲座,讲者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波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大陆,内容有历史和文学、地理与思想,也有语言与艺术,风格不仅有庄有谐,连使用的语言,也有东有西。

复旦文史讲堂希望自己是一个学术平台,“学术平



台”首先当然得“学术”,正如前一辑的序文中我所说的,作为研究专门学问的机构,我们办的讲座始终以“提升学术水准,开拓研究视野,提供前沿信息”为宗旨,即使被人认为门径稍窄,门槛偏高,我们也不想为了效果而改变初衷;其次

则是“平台”,平台仿佛舞台,舞台虽只是一个,却可以演交响乐,也可以唱京剧或跳芭蕾。只要是学术的,我们便不专主一家,在历史、文学和思想领域,不分中外,不分新旧,都在欢迎之列。因此,这里既有关于日本“唐宋变革”与王权论的讨论,也有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政策下中欧艺术史的回顾,既有宋代词学吟唱的观察体验,也有五四文学中男女关系的象征的学理讨论。当讲者妙语连珠地讲到文学语言的时候,当然气氛热烈,不过关于徐光启的理学和关于傅斯年、陈寅恪史学的演讲,尽管事涉史料甚至考据,也同样得到关注,话题具体到如许地山的藏书,或者宏观到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听众也一样热烈。所以,我们按照惯例,把叩问和应答、提示和回响,一字不漏地统统记下来,让“记录”真正地还原成“现场”。

古人说,鼎是调和五味之宝器,当今提倡学术与观念的多元和开放,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史讲堂,也私下里希望成为“鼎”,“鼎和五味”,便不嫌青菜萝卜之易得,也不重鱼翅海参之珍贵,期待的是八珍成列,五味杂陈。当然我们也知道,尽管五味需要调和,但也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烩成一锅,学术毕竟还是学术,它需要色彩各异,视角不同。(葛兆光教授序)□

外刊撷英

- 《他者视线中的江南意象》(他者 의 視線으로 바라 본 中國 江南 이미지) 金敏镐, 中国语文论丛(首尔), 第43集, 2009年

该文主要研究朝鲜人心目中的江南意象。作者分析了《燕行录》中记载的朝鲜使臣所见所闻的江南,还将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江南意象作了简单的比较。文章探讨了两个“江南”:第一,朝鲜人亲眼目睹的江南,主要引用崔溥的《漂海录》和朴趾源的《燕岩集》卷6〈书李邦翼事〉;第二,朝鲜人所听闻的江南,主要引用《荷谷朝天记》等四部《燕行录》资料。此外,探讨的对象也分为两部分:一是江南的自然、人文景观;二是江南人。

《燕行录》多记载江南秀丽的自然景观与繁华的人文景观。朝鲜人亲见的江南与所闻的江南形象几乎一致;另外,《燕行录》里的江南形象与中国人所记载的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几乎找不到与白居易的《忆江南》中出现的那种秀丽的自然景观和《梦粱录》中的华丽景象相左的描述。从整体来看,“江南”对朝鲜人来说是非常正面的、被肯定的地方。至于“江南人”,亲自访问过江南的朝鲜人多记载有“人心风俗,则和顺”的感受;尤其是“以读书为业”的风气,更增添正面的意象,这特别符合所谓“朱子学”的理想。不过,王阳明则让朝鲜人对“江南人”产生极为负面的意象;对于只听说过“江南”的朝鲜人来说,这一因素在其江南意象中更为突出。

朝鲜时期“朱子学”是他们思想的中心,佛教和道家思想被视作异端而被排挤,甚至同属于儒教范畴的“阳明学”也未被容纳,许多朝鲜使臣在中国展开有关驳斥“阳明学”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产生了“江南”与“阳明学”密切相关的印象。这种情况不仅在明末的使行中可以看到,清代亦然。对“江南人”,不管是正面的形象还是负面的想象,其价值判断和衡量的标准还是以“朱子学”为依归。

- 《漂流到朝鲜的中国人对朝鲜社会的影响》(조선에 표류한 중국인의 유형과 그 사회적 영향) 元鍾敏, 中国学研究(首尔), 第44辑, 2009年

朝鲜时期有关外国人漂流来朝的情况,主要记录在《通文馆志》、《通文汇考》、《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方文书与《海东绎史》(交聘志)、《漂海录》等个人书籍中。根据资料分析,漂流的主要原因是季风与台风,因此漂流大多发生在季风和台风盛行的月份。漂流到朝鲜的中国人大致可划分为“北方人”与“南方人”:“北方人”主要包括山东省与辽宁省的官吏、军人和平民百姓等,他们大部分在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期间漂流到了朝鲜;而“南方人”则主要是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的商人,并且是在海禁政策解除以后大规模漂流到朝鲜的。

漂流到朝鲜的中国人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两方面。正面的影响主要包



括:在中国明清两朝更迭时期漂流而来的中国人,向朝鲜政府传达了当时东亚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情况;另外,朝鲜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沥青和铳筒的制作方法,并从熟练运用官话的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汉语。负面方面的影响有:漂流来的中国人之中,有杀害朝鲜人和掠夺沿海居民等海盗式行为的发生;清朝侵略朝鲜后,经常与朝鲜交涉关于漂流到朝鲜的中国人问题,给朝鲜王朝增添了许多麻烦。

• 《回顾在韩国、日本与越南之间的两起漂流事件》
(韩,日,越사이에 발생한漂流事件검토) 陈益源,
韩国学论集(首尔),第45辑,2009年

该文讨论了韩国、日本与越南之间的两起漂流事件的始末,主要利用的两种文献:《耽罗闻见录》是韩国难民对越南、中国商人的记录,而《日本见闻录》则是越南难民对日本文化以及中国商人的记录。

具体而言,《耽罗闻见录》记录的是1687年韩国难民从济州岛漂流到越南会安的事件。书中对当年的安南风俗作了生动的描述;文末附录了〈安南国明德侯上我国(朝鲜国)文〉,篇幅虽然不长,却是韩越之间极其难得的外交文献。我们从漂流记录中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沟通方式、海上恩怨、隔离与救济措施、遣返与商卖活动以及越南风俗等。

越南汉文献《日本见闻录》所记则为另一起漂流事件:1815年越南难民从越南一路漂流到了日本。它详细记载了越南人从嘉定北上顺化时在海上遇到台风,辗转漂到日本的过程,以及他们口述的在日本的各种见闻,内容包括当年日本的风景、人物、物产、风俗等。尤其是文献记录了当时长崎国际贸易管理之严格,以及中国和日本商业交易之兴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漂流的越南人信奉的是观音和关帝。

• 《近世东亚海域的伪装漂流事件:以道光年间朝鲜高闲禄的漂流中国事例为中心》(近世東亞海域의 偽裝漂流事件) 刘序枫,韩国学论集(首尔),第45辑,2009年

近世东亚海域频繁发生的漂流事件,最主要的原

因是气候、洋流等自然因素,但其中是否也有人为的“伪装漂流”,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伪装漂流的发生,除了经济因素外,也有政治因素。该文除介绍东亚诸国间可能是伪装漂流的一些事例外,主要以一件清道光年间朝鲜济州岛民高闲禄四次漂流到中国的事例为中心,比对中国、韩国现存史料,探讨其伪装漂流的事例与经过,并分析发生的背景、朝鲜官方的处理态度以及中国对外国漂流民的救助方式。

此外,该文就中国周边的朝鲜、琉球、日本三国与中国之间的漂流数量略加整理统计。资料方面,主要用朝鲜《通文馆志》、《朝鲜王朝实录》、《日省录》、琉球《历代实案》、《华夷变态》、《长崎志》、《割符留帐》等资料。琉球方面,除遭遇台风的漂流者外,有许多是带有政治或贸易目的的伪装漂流事件(如琉球为反对日本统治,并谋求恢复旧体制,纷纷渡海向中国求援的“脱琉渡清”运动)。朝鲜方面,最突出的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而高闲禄的故意漂流事件,虽然只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对朝鲜政府而言,却关系着对中国的朝贡和外交,因此朝鲜政府非常关注该事件。中国方面,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海难救助及送还制度的完备,使得一般漂到中国的外国难民,一定可以平安返国。加上中国传统“怀柔远人”的思想,对漂流到境内的外国难民都是从优抚恤。

另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朝鲜人漂流海外的事例中,济州岛民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其中的缘由,除了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频繁的海上活动之外,还与济州岛民与琉球民相似的国家观和领土观有关。

• 《燕行诗与燕行心理变化考察》(燕行路程에 관한 燕行心理의 변화 고찰) 李春姬,韩国语文学研究(首尔),第50辑,2008年

该文主要通过分析清时期的燕行诗歌,考察燕行过程中,朝鲜使臣所关注的对象及其变化。作者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诗歌主题,清初主要以对明朝的回忆与反清意识为主。清中期以后,朝鲜人在亲眼目睹清朝的稳定发展后,开始介绍先进的中原文化,并提出积极地学习中国,该时期吟咏中国山川的



诗歌多有增加。十九世纪后,朝鲜使臣更多地关心清朝的政治局势,因而燕行诗歌里经常出现有关清朝人物方面的内容。第二,早期《燕行录》主要以记载中国行程为主,而后期则增加了朝鲜国内行程的描写。第三,对自然、人文景观的评价。清后期《燕行录》对燕行路程上的中国自然、人文景观的评价远远低于早期,甚至更多地主张朝鲜自然环境的优越性。第四,对中原人物的评价与历史故事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孟姜女、季文兰等历史故事,经过朝鲜人的润色后,都演变成了不同的故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作者分析了朝鲜人对华心理的变化,认为反映出朝鲜人开始逐渐脱离传统的华夷观,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

• 《琉球侵攻和日明关系》(琉球侵攻と日明關係) 渡边美季,东洋史研究,第六十八卷第三十号,2009 年

1609 年日本萨摩藩侵攻琉球,此后琉球虽然仍保持着对明朝的藩属关系,但实际上已受日本统治。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该文主要分析“侵攻事件”后琉、日、明三方的动向,尤其注意把握近世琉球国际地位的变化过程,凸显当时的日明关系以及琉球在其间的中介作用。此外,在史料方面,该文尝试从多角度整理和分析东亚各国的资料,以此弥补过去史料检讨的不足。

具体来说,该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明朝对“侵攻事件”的反应以及该事件对明朝的影响。尤其是详细地介绍了 1612 年琉球成为日明贸易的中介之后,明廷对琉球的认识。作者发现明朝社会支配层通过邸报和科举考试来认识上述事件。因此,作者试图通过分析科举考试“策问”中的时务问题及其答卷,来揭示明朝统治阶级对琉球问题的看法和对策。作者指出,明朝内部其实存在着多样的意见,甚至包括允许日明贸易。第二,已有的研究对琉球在日明贸易上的中介作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该文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整合各方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解释。尤其是通过琉球使者的外交活动,深入

探讨了先行研究上的几个问题。第三,关于“侵攻事件”的历史意义,该文脱离过去的琉球对幕藩制顺逆的观点(强调萨摩、幕府的琉球傀儡化,或琉球的主体性),试图在东亚国际关系(尤其是日明关系)中进行整体的把握。作者认为琉球被侵略后建立了对日明两国的双重朝贡体制,琉明关系和日明关系两者间并没有矛盾。

• 《薛瑄〈读书录〉在东亚的刊行与变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薛瑄《讀書錄》の刊行と變容) 白井顺,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六十一集,2009 年

薛瑄的《读书录》在明清时期被人们广泛阅读,在朝鲜和日本也有出版。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版本情况和在东亚各国的阅读情况都不太清楚,该文即考察这一问题。作者主要使用“书志学”的方法来整理和分析。

该文的研究表明,《读书录》在东亚成为正统的朱子学读物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之间存在差异。该文侧重分析地域间的差异。在中国,《读书录》以“硕学语录”的形式存在。基于此,人们反复对《读书录》进行简化或再编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读书录要语》和《从政名言》,成为独立的著作。而在朝鲜,李退溪等儒家学者高度的评价薛瑄的《读书录》,将之当作继承朱子的正统读物。《读书录》由于其平易的特点,成为切实的朱子学“语言集成”,获得了高度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读书录要语》比《读书录》更为普及,《要语》反而取代了《读书录》,变成诸如《近思录》之类的基础读物。再来看日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人们阅读《要语》的记录;而《读书录》一般以和刻本的形式出版,成为可以与《朱子语类》或者《朱子全书》相比拟的重要书籍。与《要语》的遭遇迥异的是,《从政名言》成为了实用的官箴书,这是《读书录》在日本流通的特有现象。□

黄普基 摘译

博士后论坛

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驿路聚落研究

黄普基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聚落因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文化传统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聚落的地域性一般表现在聚落分布、规模、形状等方面。就影响聚落的经济条件而言,交通环境无疑首应注意。关于这一点,历史时期驿路沿线的聚落情形更具有典型性。驿路具有政治、军事、地区交往、通商和民族往来的功能,这些功能直接影响路边的聚落。因此,驿路边聚落的发展轨迹与景观形态呈现出其独特性。

清时期的驿路,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几个方向延伸。其中东北方向驿路,从北京经过冀东地区,然后经山海关,沿辽西走廊到辽东,乃至东北各地。笔者主要想探讨这一路线(即辽宁、冀东地区)的驿路聚落。

辽宁、冀东地区因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分成好几个次一等的区域;而且各区域内部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造就了聚落的区域性,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探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河北地区聚落的研究成果不少,而辽宁地区则很不足,该地区聚落的诸多特征以及发展演变情况均未能得到揭示,这主要是由于资料的缺乏。

《燕行录》的整理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燕行使臣们在《燕行录》中描述了相当多的驿路边聚落的特征与其发展过程;并且他们还注重记录

各聚落之间的距离与方位。因此,可以说它是全面分析清时期该地区聚落情况的最佳资料。

研究表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的各区域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农业、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区域的聚落在分布、规模、形状上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辽东山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农业不发达,聚落分布稀疏;该地区的聚落呈现出以小村为主的散居型分布格局,规模不大;而聚落形状多为星点型和串珠型,以前者较为典型。

辽河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较少地形限制,因而许多聚落发展成为集居型的聚落。聚落的规模较大,多拥有店铺,商业较为发达。在聚落形状方面,多呈现为“列村”形状,一般都是连亘的长条线状。更细化的归类,可以归入对马路的依赖程度大的“街村”类。

冀东地区的聚落分布相对密集。在聚落规模、形状方面,永平府与顺天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就聚落规模而言,顺天府因地处平原,较少受到地形的限制,再加上这一带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因而多出现规模较大的集居型聚落。相对来说,永平府受地形限制较多,聚落规模较小,而且其密集程度也不如顺天府高。而在聚落形状方面,顺天府聚落多为“街村”形状;而永平府则多为规模较小的“路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0.04—2010.06)

- 2010 年 4 月 1 日

新聘的专职助理研究员朱莉丽博士报到,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交流史。

- 2010 年 4 月 3 日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 Rutgers 大学参加“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真武崇祀”国际学术讨论会。

- 2010 年 4 月 7 日

刘震副研究员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作题为《印度学与佛学入门》的学术演讲。

- 2010 年 4 月 12 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才子与佳人——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的学术讲演,李星明研究员主持。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太史文(Stephen Teiser)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讲《中国中古道教仪式的演变——以〈洞玄灵宝五感文〉为中心》。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作题为《从唐诗名篇的疑问谈全唐诗文的编纂、利用和新编》的演讲。

- 2010 年 4 月 14 日

我院举办第二十次小型学术研究会,邓菲副研究员作题为《图像、仪式与习俗:对宋金墓葬图像系统的

思考》的报告,李星明研究员主持。

- 2010 年 4 月 15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作题为《利玛窦之前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的学术讲演,该校比较文学系 David Porter 教授主持。

- 2010 年 4 月 17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上海海事大学郑和研究中心主办的“关于中欧合作研究《西记》”学术研讨会,并从本年度起担任郑和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职教授。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作题为《破镜重圆和司空见惯——从〈本事诗〉二则考辨谈唐代文史研究方法》的演讲。

- 2010 年 4 月 20 日

我院举办第十六场博士后论坛,黄普基博士作题为《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驿路聚落研究》的报告,李星明研究员主持论坛。

- 2010 年 4 月 23 日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讲《关于日本、朝鲜和越南汉文文献中的中国史料》。



• 2010 年 4 月 28 日

葛兆光教授会见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教学与研究委员会代理主任 Edwin Turner 教授、副教务长 Diana Davies 女士与东亚研究所所长艾尔曼教授,商讨复旦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际合作协议,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三方合作计划。

我院举办第二十一小型学术研究会,访问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田梅(Margaret Tillman)作题为《民国儿童教育心理学:从“儿童学”到“儿童心理卫生学”》的报告,复旦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德国不来梅·雅各布大学人文科学系史明(Nicola Spakowski)教授主持。

• 2010 年 4 月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的论文《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谈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发表在《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与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主编的《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2010 年 5 月 14 日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我院特约研究员马小鹤先生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引路菩萨和引魂明使》的学术讲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院特约研究员芮传明先生主持。

• 2010 年 5 月 17 日

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汪悦进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秋坟鬼唱鲍家诗:罗聘〈鬼趣图〉新论》的学术讲演,葛兆光教授主持。

• 2010 年 5 月 22—23 日

我院召开“批评的中国学(二):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十名海内外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夏伯嘉教授主持会议。会议议题

包括:(1)西文文献对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思想、文化、宗教、社会、科技、近代化进程等方面的价值;(2)在利用西文文献研究中国问题过程中应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主题、视野的拓展;(3)拉、葡、西、意、荷、法、德等西文文献中的中国,以及中国形象在西文文献中的转变;(4)有关中国的各语种西文原始文献综合介绍。我院董少新副研究员提交了题为《西文文献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 2010 年 5 月 23 日

《文汇报》刊载葛兆光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题为《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的讲演。

• 2010 年 5 月 24 日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永远的圆明园——法国人眼中的“万园之园”》的学术讲演,我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主持。

• 2010 年 5 月 25 日

我院举办第十七场博士后论坛,李慧玲博士作题为《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问世的时代背景浅析》的报告。

• 2010 年 5 月 25—29 日

双聘研究员陈引驰教授应邀访问香港城市大学,在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作学术讲演《印度佛经故事口传入华之途径与语言交际问题》,并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诠释、比较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说〈文心雕龙〉“论”之儒踪佛影》。

• 2010 年 5 月 27 日

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陈晓漫副校长率学科建设办公室、文科科研处负责人来我院调研,听取了葛兆光教授关于文史研究院近期工作以及建设“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博士课程计划的汇报。调研结束后,调研组成员与全院人员亲切交谈并合影。

刘震副研究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天隅地轮,彼美一人——印度学的形成和研究范畴》的学术报告。



• 2010 年 5 月 28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题为《王国维与上海东文学社》的论文。

• 2010 年 5 月 28 日—29 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的论文。

• 2010 年 6 月 1 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历史系 Hans Beck 教授和 Griet Vankeerberghen 副教授来访。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应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吕绍理教授邀请,开始在政治大学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访问。

• 2010 年 6 月 3 日

我院国际评鉴委员、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中欧“之间”和移位: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图片传播》的学术讲演,我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主持。

• 2010 年 6 月 7 日

文史研究新方向暨文史研究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隆重举行。会议邀请了我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双聘研究人员、复旦大学校方及相关部处参加。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和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到会并致辞,葛兆光教授在会上作文史研究院三周年工作汇报,第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对文史研究院三年来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随后,校方宣布了文史研究院第二届两委名单并颁发聘书,其中,新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成员是:夫马进教授、钟鸣旦教授、张隆溪教授、邢义田教授、王德威教授,以及新增成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教授;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是:李孝悌教授、艾尔曼教授、郑培凯教授、末木文美士教授、陈大康教授、陈思和教授、吴晓明教授、章清教授、汪涌豪教授、周振鹤教授及葛兆光教授。会上,我院还与日

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东亚研究所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

下午,与会专家与我院学者就“文史研究新方向”的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 2010 年 6 月 10 日

我院国际评鉴委员张隆溪教授、罗多弼教授,学术委员艾尔曼教授、陈思和教授在《解放日报》“文化讲坛”作主题为“多元世界的文化立场”的讨论,葛兆光教授任嘉宾主持。

当日,我院新一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语系罗多弼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的学术讲演,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张隆溪教授主持。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应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郑文惠教授邀请,作题为《晚明至晚清:内部史与外部史》的报告。

• 2010 年 6 月 13 日

我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召开《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新书发布会。丛书由我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撰,共 2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研究员丁克顺、张德果,我院葛兆光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等参加了发布会。

• 2010 年 6 月 14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应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作题为《〈七奇图说〉与清人视野中的“天下七奇”》的报告。

• 2010 年 6 月 15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域外版第 13 版发表刘震副研究员的《印度学漫谈》。

• 2010 年 6 月 17 日

我院举办第二十二次小型学术研究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王平作题为《诗歌中的文本风景:以枫为个案》的报告,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主持。

• 2010年6月18日

我院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办“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小型学术讨论会,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的五位学者参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主持。

• 2010年6月19日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新书发布会在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举行。我院葛兆光教授、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文科科研处杨志刚处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韩结根编审,云南大学贺圣达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冯超老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越南汉喃研究院郑克孟院长主持,葛兆光教授、贺圣遂社长分别代表中方致辞,汉喃研究院前院长陈毅、潘文阁教授,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阮春胜、武庆荧教授等也出席了会议。

• 2010年6月21日

我院赴越南代表团访问位于胡志明市的南方发展研究院,并与该院学者举行座谈会,南方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清创主持。葛兆光教授在会上致辞并向越方简

要介绍了文史研究院的情况,该院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分别发言交流。会后,代表团还拜访了《西贡解放日报》(华文版),主编阮中部先生接待。

• 2010年6月25—26日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参加国际中国哲学会、武汉大学主办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东亚儒学”刍议——就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为核心》。

• 2010年6月

“复旦文史讲堂”第三辑《鼎和五味》由中华书局出版。

朱溢副研究员的学术论文《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

孙英刚副研究员的研究课题《西方范式与中国研究:学术关键词的梳理》、朱溢副研究员的研究课题《唐宋吉礼变迁研究》获得2010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至此,我院已有四名研究人员(2009年度为董少新、刘震副研究员)获该计划资助。□

金秀英 整理



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丛书共25册,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6月13日和19日,丛书新书发布会分别在上海和越南河内隆重举行。



2010年5月22-23日,我院召开“批评的中国学(二):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十名海内外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夏伯嘉教授主持会议。

封面题字 秦绍德
封面图像 越南燕行文献《燕轺日程》
中所绘岳阳与洞庭湖

编 辑 杨琴 肖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g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